



TITLE:

# 资本主义以前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AUTHOR(S):

大西, 广

---

CITATION:

大西, 广. 资本主义以前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京都大学経済学部Working Paper 1995, 29

ISSUE DATE:

1995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37921>

RIGHT: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与  
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大西广著

Faculty of Economic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 JAPAN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与  
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大西广著

##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为了对前苏联与东欧的事情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说明而执笔的。1991年苏联革命之后，笔者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1992年2月由日本大月书店出版了日文版。这次的中文版，除了一小部分之外，与最初的日文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借中文版完成之际，我在此想表达一下我对现存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期待。

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大多数来自中国，这是我最近有机会重新感受到的。例如，我们日本人也使用汉字。我们日文中的字母也是从汉字演变过来的。在日文中，汉字有两种读音，其中一种就是从中国输入过来的。这些都表明，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在我们日本，每5个人中就有1人知道司马迁所讲的三国历史，三国方面的书至今仍是最畅销的书。在日本的高级中学里，也在用原文传授孔子、老子、庄子的事情。我们的很多智慧是从中国的历史中学来的。

最近，笔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机关做了一段研究访问。在那里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印尼的古董与美术品中，很多标明着是宋代的、元代的、明代的制品。这都表明，东南亚也在中国文化圈之内。在此，真切地希望中国对世界文化与思想的普遍性贡献应该持续下去。

关于中国的事情，我不得不想到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错误。笔者也绝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支持者。但是，当年的毛泽东路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支持，并且，作为一种思想也得到了尊重。那时，很多人在把中国作为强国之前，首先把她当作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定会成为经济大国。但是，这也正是这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课题。世界需要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思想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思想能被普遍化呢？笔者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本书中，笔者反复讲述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老朽化了的时候，就应该努力地扬弃之，当资本主义是必要的时候，就应该不惧怕它，向前推进它。这段言词不是在模仿邓小平的讲话，而是从邓小平的政策中学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笔者认为，以上的内容对亚洲其他国家，例如印尼、菲律宾、韩国、台湾等都具有普遍意义。从经济制度看，中国与其它



的亚洲国家一样，在搞资本主义。从历史的长河中来分析，这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原因。但是，亚洲的经济若是象现在这样持续发展，经济制度的再转换早晚还要成为课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那个时期也许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是有必要进行理论化的。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中国，因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很多人认为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了。即使不是这样认为，也似乎没有多少人对现在的资本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整理。基于这样的考虑，特意将本书译成中文。作为一个日本人，笔者的这份热心与坦率的诚意若是能被接受，那将深感荣幸。

## 前 言

自1991年夏天苏联的“八月革命”到苏联的消亡，进而到九二年初的价格全面自由化，“正向资本主义迈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越南的经济改革以及对个体企业雇用劳工的容忍，益加向前推进。从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方向。对于“社会主义”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这个新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基于这样的疑问与思考，笔者撰写了本书。

对于上述的现象与变化已经存在着一些说明。例如，“此乃官僚型社会主义向市场型社会主义的转换”之说便是其一。但是，前苏联或是东欧的新一代政权的大胆的民营化举措已经是明明白白的“资本主义”了。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政权以来的合作社(cooperative)，伴随着资本·劳资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已是资本主义企业。这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无法容忍将这个变化强词夺理地称之为“非资本主义式”的变化。

另外，也有人将这个资本主义化称之为当政者的失误。但是，将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相同的变化均称之为失误的说法至少是理论家所不能允许的。如此这样的大量现象的产生，其中必有某种“法则”存在。科学在对这种现象发出感叹与欢迎之前，应首先对其作出说明。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就在于能否用历史的变迁作为“法则”对其做出说明。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虚心坦率地看前苏联的“资本主义化”——合作社恢复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纪律，服务与生产效率快速提高，合作社职工的工资也提高到了其他部门不能与之相比的高度。显而易见，这个“资本主义化”正在作为历史的进步被实行着。在1989年及91年的“革命”时期，苏联与东欧的民众对这个潮流的大力支持实为顺理成章之事。

但是，若是对这种历史所要求的东西能做出正确反应的前苏联与东欧的民众，为何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着那种旧体制呢？笔者认为，至少在距今天10年至20年以前，那里的民众是支持旧体制的，并且，那种支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失误”与“强制性”的，而是存在着与这种支持心理相适应的东西的。

实际上，曾经是列强诸国里最落后的俄国，当它在战后敢与美国争雄，并且先于美国将人造卫星送上天的时候，对于它的快速的发展予以正视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西方进步势力所赞美的“社会主义”，甚至连西方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总之，前苏联与东欧的民众对旧体制的一时的支持绝没有错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我们对那个社会主义的赞美也没有失误。现在，在西方各国的知识人中间，开始对过去的赞美产生后悔，并且这种趋势正在急速扩大。但是，还是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而应该对过去的心情本身进行再一次分析。即不仅仅是“进步势力”，就连保守派也应该再次分析一下当时对其进行赞美的原因与根据，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因为斯大林体制，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饿死者，在政治上，曾经采取过极端的做法，杀反体制人士，这样恐怖的独裁制是无法肯定的。那些与人权压制进行持续斗争的海内外人士被给予了永垂不朽的名誉，这与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名誉永远存在是没有过大的区别的。

我们不应仅仅愤怒于现状，做一个只知感叹的人，而应该去说明独裁体制为什么能长期维持住，并被民众所承认。关于这一点，与其说“独裁也可以带来成长”，倒不如说“正因为独裁才带来了成长”。这似乎可以是一种解释。

不仅是斯大林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甚至非洲也有不少独裁国家。这些独裁国家的多数，在工业化上都收到了一些成效。就连日本也曾经有过天皇制下的独裁统治，并且，在那时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成长。总之，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独裁的与集权式的经济是不可缺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采取独裁，即集体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独裁或集权经济体制则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了，充其量只能将其理解为这是低开发国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征。从而，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开发独裁的一种形态。尽管它将目标定为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经济开发而采取的一种独裁形式而已。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化现象，绝不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而是从开发独裁向普通的资本主义的转化。从而，我们可以举手欢迎苏联与东欧的这个带有进步意义的变化。

理解以往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应该对社会主义的形象重新看待。以往的社会主义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对经济加大控制，进而实行公有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这样的集权经济的认识是不能怀疑的。进而可以断言，集权不是社会进步，应该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法则来理解国家的缩小，来理解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化的趋势，而且可以更加现实地展望马克思关于国家将消亡的命题。



大体上看，到目前为止，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上的归纳，大致包括如下内容，①劳资关系，②市场机制。如果以市场机制而论，限制市场，即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但实际上，市场与计划并不是区分两个体制的基准。

我们可以用劳资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废除了劳资关系。或者，作为劳资关系更实质性的内容，我们若是注目于工作场所的“资本的专制”问题，那么，不管是私人资本对劳动者的专制，还是国家资本对劳动者的专制，其实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本质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是以往的社会主义，还是发展中的独裁国家，其实只不过都是一种“国家”的资本主义。这个理论上的内容在本书中是不可缺少的。

前苏联与东欧的独裁开发已经终止了其历史使命，并且正开始向普通的资本主义迈进。将来，若是中国、越南(包括北韩)都完成了这一转变，那么，全世界则就变成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化了。这是明确的历史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历史进步是否到此就结束了，还是应该再继续向前。资本的专制是永远的？还是它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真正的问题，是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改变我们这个因长时间劳动而过于残酷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也是生产力方面所不可缺少的。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无关，但却是每天都在质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超越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资本主义自身应该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应该去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现象中展望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本书另一个课题。

基于上述的思考，撰写了本书。这本书写作的直接契机是1991年8月发生的苏联政变。当时，每天一边看着让人吃惊的电视报导，一边在思考着有必要将这样的事态做一番总体上的评价。所以，急速之下写成了本书。

苏联政变后的数月之间，南斯拉夫、柬埔寨又发生了独自的事情。1991年底苏联邦消亡了。第二年初，俄国又实行了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这样激荡的情况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

但是，试想之，也正是这些不能预测的事情才是社会科学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预测并不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将社会诸现象用历史的法则加以科学的论证则是更重要的事情。所有的社会学者都应该尽个人的能力对社会的课题做出挑战。

作为笔者的挑战，谨将此书奉献给读者们。

# 目 录

## 中文版序言

## 前言

### **I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 **1.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化**

民族对立的本质是什么？ / 成为生产力桎梏的旧体制 / 前苏联与东欧的资本主义化 / 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之路 / 亚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 / 越南与北韓

#### **2. 自上而来的资本主义之路**

列宁有意发展资本主义 / 返回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论 / 从列宁到斯大林 / 再评罗斯托理论 / “集权”是带来生产性的条件 / “计划”不是社会主义

#### **3. 作为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生产力的人的要素 / 技术与人类的历史

#### **4. 八九年与九一年为何出现了市民革命？**

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 / 中国的“关系社会”与官倒 / 与绝对王政斗争的回忆

### **II 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资本的腐朽是什么？**

#### **5. “软性化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新型年轻人摆脱公司的束缚 / “都市里的知识青年”与“阿谀奉承”之辈都不是“公司人” / 变化的实质是劳资关系的变革 / 变化中的生产力的基础 / 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资本是其身的掘墓人

#### **6. 情报革命与市场机制**

“个性的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 企业组织的软结构化 / 情报化有助于中小企业 / 多品种小数量的生产与情报成本的降低 / 个性、自由与市场机制 / 由市场所连结的新的人际关系 / 为了使市场消失的市场

7. “不要国家”意味着什么？

斯大林与无政府主义 / 为了国家消亡的国家 / 幼稚产业保护过程中国家对产业的支持 / 软性化社会使产业自立 / 自愿主义的条件

8. 社会主义是什么？

熊彼特与马克思 / 劳动运动的作用 / 劳动市场的意义 / 对新型年轻人现象的马克思式的理解

补论1 社会主义的滞胀

社会主义式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克鲁那依 / 菲利浦斯曲线与“自然供应不足率”假说 / 两种类型的“政府的失败”

补论2 彼拉维拉曼的劳动过程论与社会主义

彼拉维拉曼的理论贡献 / 对彼拉维拉曼的批判点 / 马克思学说中的生产力与劳动过程 / 软性化社会与劳动的未来

结语



## I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在第I部分中，让我们来讨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以后的二种形式。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内容，其实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课题。

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之前的东西，更不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东西，这个疑问在原理上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这个疑问，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在急速地向资本主义转化，这其中定有必然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

从而，在第I部分中所提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勃兴时期的社会内容，而不是象现代日本社会这样的状况。另外，回顾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例也是本部分的主要内容。

为了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与现代日本社会的差异，让我们用汇率来计算一下前苏联与中国的人均收入。俄国人平均月收入是4千卢布，若用1美元=170卢布的现行汇率来计算，只值300日元，连日本的每小时工资都不如。就算用这样的汇率换算会出现过小评价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无视这样的差别的。另外，199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325美元，这只是日本当年人均收入2万4千美元的1—2%的水准。或者也只有菲律宾727美元的一半以下。探讨以上这样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使人感觉到象是在谈论半个世纪以前的日本的情况。这种历史感觉是必要的。这也是认识问题的一个前提。

资本主义向更高的阶段的迈进，在当今还没有成为历史的课题。但是，资本主义内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则终于成了带有课题性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化确实是极为必要的。

历史不会简单地倒退，世界确实在向前迈进。在本书的第I部分中，我们将详细地对此做出考察。

## 1.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化

民族对立的本质是什么？

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中开始的苏联的解体，到车臣共和国的独立纠纷。再到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俄国与前苏联的危机状况让我们实在不能不联想到民族问题。但是，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危机并不是民族这个上层建筑问题，而是经济基础的问题。即，至少可以说，在前苏联与东欧，经济危机带来了民族危机，而决不是相反。在讨论前苏联与东欧解体的问题时，这是首先应该谈到的内容。

至少，在前苏联与东欧，如果经济能够成功，则不会出现民族危机。因为，指导苏联经济的是社会主义，这是超越了民族并且曾经被广泛支持过的意识形态，所以，如果前苏联能保持其经济上的持续增长，那么民族上的差异将不会被过大地描绘。实际上，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只是将人分成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民族和其他问题并不重要。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并不是主要民族出身的俄罗斯人，但他能站在最高位置上，这也是前苏联民族问题的一个佐证。

或者，即使不存在这样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只要前苏联的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主要民族的俄罗斯人能够继续给中亚一带的贫困共和国以援助，或者中央对较富裕的波罗的海地区的搜刮轻微一些，也许民族问题会被缓解。如果主要民族的经济发展不能良好地波及到周围的少数民族，那么，经济发展导致民族安定的关系也示未必能成立。所以，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

成为生产力桎梏的旧体制

当一个体制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时，对于这个体制的批判在双重意义上将无法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旧体制的崩溃以及向新体制的转换则完全是必然的事情。

那么，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经济危机呢？这个问题必须回答。但是与其回答这个疑问，不如先去描述产生这个经济危机的机制（更加全面的解答让我们留在下一章）。

这里，首先须讲述的是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仅仅在被限定的范围之内有效。例如，现在我们假定将要生产的物资的种类仅有10种，并且这10种物资作为生产

资料被投入生产，继而这10种物资又生产出10种物资（例如，投入钢铁、煤碳、石油、汽车、建筑物等等用来生产钢铁、煤碳、石油、汽车、建筑物），那么，为了这个生产活动我们必须预算出 $10 \times 10 = 100$ 的投入—产出计划数字。进而如果每种物资的工厂与产地若是分布在10处的话（例如油田有10处），那么我们必然得出 $(10\text{种生产物资} \times 10\text{家工厂}) \times (10\text{种生产物资} \times 10\text{家工厂}) = 1\text{万}$ 的计划数字。以上是生产物资仅为10种的场合，若是100种（即使仅有10工厂）则为100万，若是1000种则为1亿，若是1万种则为100亿。从而，现实中会出现位数众多的的计算。这样的计算在现实中只能被认为是极少有可能性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实现这样的中央计划，极端性地限制生产物资的种类（例如在中国，一时期内只有青一色的制服）和工厂数（为了减少工厂数而培育大型联合企业，农业亦实行集团化经营）是不可缺少的。反之，只有在这样低级的生产力阶段，中央计划才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失去其效益的时候，也正是生产力向前发展了。这种皆大欢喜并且是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央计划体制自身不仅使各工厂与事业单位的经营能力变得不必要，而且对于工厂与事业单位的经营能力的培养也存在着负面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养成动脑筋、善于设想的能力，必须存在着能将那些设想付诸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设想绝对不可能变成现实，那么还有谁去徒而劳之呢。“一切均由中央政府替我们来考虑”的体系终将剥夺所有的社会运营能力与生产能力。

但是，“一切均由中央政府替我们来考虑”的体制也未必就是非生产性的。“增加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动员在其可能做到的时期，也可以推进生产体系的改善（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就怀有此种目的）。当各个工厂的自我判断与决断能力还没有养成的时候，由中央政府（或者党）将计划付之于工厂的做法也可以认为是能够提高生产的。从而，在各工厂与经营单位不成熟的时期，将需要中央计划，反之，则无须中央计划。当前，中央计划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则又从反面反映了工厂及经营单位的一定程度的发达。

中央计划体系未能实现提高生产物的质量是其“失败”的主因。也就是说，在中央计划体系的情形下，生产物是否适合消费者的需求则非工厂关心之事，各工厂只是根据中央计划部门的计划基准来运作而已。例如，火炉生产工厂只是连年生产笨重的火炉（这是事实），这样做不可能有技术革新，也不可能制造出良质的产品，服务也不可能跟之而提高。没有通过市场与消费者接触的指令型经济体系其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在生产水平较低的阶段，这种体系的弊端并不是如此那么大，因为比起火炉的质量来，（为了全国百姓不被冻死）则更应该优先于数量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质量的改善与技术开发让位于下一个阶段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换言之，制品的质与服务问题本身是以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为前提的。从而，中央计划体系弊端的非一般性或者它的弊端的显山露水的特征也相应地是其完成了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的证据。

### 前苏联与东欧的资本主义化

根据上面的论证，旧“社会主义”、即中央计划体系的失败并非是由于其自身的失败而引起的，而是在于低开发时期它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引起的。也就是旧“社会主义”正因其成功才导致了它的失败。

因此，这些旧“社会主义”国家废除或是缩小中央计划体系，引进“市场”，并且正以此而向全新的体系迈进。尽管今后会因为经济危机的深刻化而显示出左右摇摆，但是作为前进的方向它将不会逆转。进而，在充分有能力管理自身企业的企业家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以及在他们手下劳动的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与扩大。作为其中的一个形态，勿庸赘言，将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初期，民营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工厂的租赁与股份制的现象。后者作为民营化的主流，在很多场合，将工厂的股票分配给了工厂的职工。但是，尽管如此，作为民营化了那些企业的经理们，大多数是原国有企业的干部，现在，他们不单单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企业家”担负着对劳动的指挥（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经济将出现破绽的状况）。从而，在此我们想说的是，不论形式如何，实质性的劳资关系，即资本的专制性的支配已经从这个阶段到每个劳动过程中复活了（或者正在期待着复活）。

当然，为了培养这样真正有觉悟的“企业家”，并且恢复所谓的“车间纪律”，全体职工所有企业（让职工持股）也未必是有效的方法。勿庸赘言，这是给培养经理们的觉悟与指挥权泼冷水。因为最近的民营化已不是职工持股化，而是向全体国民分发“民营化支票”，通过市场交易确立职工以外的所有权，并以此来试图强化经营阶段对职工的指挥权。遗憾的是，这样的民营化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与不公正现象，这些也是笔者九三年在现场调查时所亲眼看到的。但是，若无这样的过程，握有真正的指挥权，带有真正的自觉性的“企业家”将

无法大量产生。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正，何者必要，何者不必要，现阶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前进以及历史应该被向前推进。这些“民营化”最近又以引进外资的形式被向前推进，也就更不用多言了。

### 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之路

所谓“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之路”，是指劳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强有力地向前推进，从而少数个人经营者逐渐地雇用工人的道路。例如，1987年，前苏联实施“个人劳动活动法”奖励原来的集权经济所不熟悉的家庭内手工业和服务部门的个人企业。这项法规实施一年后的1988年4月，个人企业的职工总数达到 37 万人，进而一年之后又增加到了73万人(西冈俊哲论文，“苏联的个人企业与合作社”《阪南论集，社会科学编》第26卷第一号，一九九〇年)。这样的经营形态无疑是时代的要求。

但是，“个人企业”未能冲出家庭劳动的框框。正因为这个限制，“劳资关系的创立”无法产生。允许个人企业雇用工人是在1988年实行的“合作社法”之后的事情。这个新法则所允许的，称作合作社的企业形态，要求出资者在三人以上，其实质是作为家族经营的，三个资本家所构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另外，其平均雇工已达到25.1人(参见表1)，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劳资关系。从成长率的角度来看它也已经超过了“个人性劳动”。在那个新法则实施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有17万个合作社在运营，雇员已达403万人(参照西冈的上述论文)。从1989年的这个数字到目前为止已是两年有余的，在这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道路中，估计已产生出100万左右的资本家和1000万的劳动工人。可以说，在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英国当年的内容有其共同性。

这种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决非倒行逆施。这从两种意义上可以说明之，首先，它可以解除在旧体制时代使生产停滞的各种条件，再者，这个过程可以培养脚踏实地、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家”。

事实上，前面所讲到的国有企业的处理方式，即民营化，因其运作力的不足，正在面临着困难。引起这些困难的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到目前为止习惯于生硬的管理方式的官僚们不具备正经的经营能力。改革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资金的不足”，也不在于技术水平的低下，而在于人材，即“企业家”的不足。特别是旧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对经营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所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讲，从“下部”培养稳健的“企业家”将是最重要的课题。

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处理原国有企业，而是让经营者依靠自己(或家庭)的力量进行经营，其中的成功者增加对劳动力的雇用，进而在有经营能力的企业中产生“劳资关系”。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使经营较好的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象预想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必须扩展到一定的规模。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市场竞争”，那么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企业与无经营能力的企业将无法区别。反过来讲，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将无法实现对更多的劳动力的雇用。现在的经济改革，在允许这样的新的企业形态的同时，与价格自由化等市场机制的引进一起被向前推进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虽然以上几乎没有论及到，但在所有的东欧各国，旧体制派几乎都退出了政坛。那里正在与前苏联的动向一样进行着急速的改革。总之，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是有意识地创造劳资关系，并且这个改革正在由与旧体制相异的新的政治势力来推进着(这样的权力我们称之为“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例如，在捷克共和国，1991年对1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民营化，1992年还将计划对1100家国有企业采取相同的措施。这个计划如果付诸实施，那么，现存的国有企业，包括公共事业将减少到500家。如果只留下有能力的“企业家”，那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出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诞生。这条道路尽管迂回曲折，但在几年之内，原苏联与东欧各国将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过程作为生产力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作为历史的必然，正在被推进着。这个过程是重要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承认它。

### 亚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

如上所述，在原苏联和东欧，旧体制的执政党被打倒，“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换基本上已成定局。但在另一方面，执政党依然牢固不变的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呢？中国、越南的经济改革动向远早于前苏联和东欧，相反，北韩却始终迟迟不动。对以上的情况我们应该分而论之。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结局，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在资本主义化。这是在此我们要论述的课题。

首先来看中国，①中国革命完成之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即实行农民自耕农化。②大跃进时期达到顶点的农业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化。③邓小平·刘少奇主导的“经济调整政策”，即分划人民公社，允许个人企业的存在。④文化大革命对个人经营的压制。⑤邓小平的复出所带来的个人企业和小资本的诞生。建国以



来的中国，基本上是沿着两条对立的路线来争夺主导权的，即培育、鼓励个人企业的改革与用集体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动员来促进生产这两条路线。但是，重要的是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个人经营与小资本实实在在地成长起来了。

首先看农业部门的个人经营状况，80年代后期，农户已达2亿户。所说的“万元户”正是其中的经营成功者。其次，来看工商部门，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在1989年6月已达1200家（见1990年1月23日《北京周报》），平均雇工达2人。在那里可以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劳资关系。被称为乡镇企业的村镇所有或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已经雇用着亿人以上，那其中的经营阶层的收入一般高于工人的5-10倍，事实上，他们作为“资本家阶级”正在成长着。扎扎实实、遍地开花式地培育着资本·劳资关系的现状则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特征。

当然，当代中国的资本·劳资关系并仅限于这种自下而上型。以沿海经济特区为中心的外资引进以及给国有企业的自主权的形式也正在向前推进。例如，上海有麦道公司出资建立的飞机工厂、福斯公司的合资企业。北京有克莱斯勒，重庆有铃木的合资工厂。另外，1984年以来的改革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厂长责任制。尽管这种制度还不成熟，但由厂长通向企业家的道路已经开始了。

比起自上而来的资本主义化，自下而来的资本主义化更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显著的特征。这与前苏联、东欧的情况迥然不同。中国并不象前苏联、东欧那样严重地缺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局变动、多次流血、长期摸索的结果。在遍地开花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九个月创造利润12亿，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遍设分支机构的大型贸易公司已经出现（《北京周报》，1990年1月1~7日）。这种来自底层的、漫山遍野式的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在被显示着。

但是，这种“自下而来”的资本主义化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也是不可能产生的。例如，如果对私营企业的税率定得过高，那也会抑制成长率的。市场机制的引进本身也带有政府的政策上的意图。允许“赚钱”状况存在的本身比起其他的经营方式来正在显示着它对成长率的促进。作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手段，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对私营企业予以重视，并对其成长寄以希望。如前所述的对高收入经营阶层的承认正在清楚明白地成为“培育资本家”的政策目标。

勿庸赘言，现在的邓小平政权提倡“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但对政治独裁却丝毫不想放松。不过，独裁政治推进资本主义化的例子在过去也多有存在。比起政治口号来，“社会主义”是否真正优待资本家阶级，是否在促进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资本·劳资关系)的产生则是更重要的问题。进而即使是对改革有很大影响的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没有使改革的方向(至少在经济上)改变。因为邓小平政权代表着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所以它带有“资本家阶级的权力”的性格。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尽管在思想上支持“社会主义”,但它的权力上的性格并不由其出身来做最终的判断。确实,政治家不论其出身属于那个阶层,用现实的政策来判断事物则是科学的方法。

从这个观点出发,上述的前苏联、东欧境内的新政权当然是“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但是更早地推行“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的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则更引人注目。邓小平在早期留下的那句名言——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便是其最好的表达。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不是从抽象的“思想”出发来思考政策,而是从“对现实有无好处”、“是否必要”这条基本路线出发,促进着“资本主义化”的。

邓小平在1984年的一次讲话中有过如下的论述,“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太明确。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其他,……,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参见天儿慧著《彷徨的中国》,朝日新闻社,1989年出版,120页)。

我们不认为当代中国的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义”。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的是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制度。尽管很多人有误解,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是想建造那个时代最需要的(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象邓小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多的。

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将这个思考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从而出现了要在21世纪中期实现现在中等发达国家以下的水平,即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历史不能超越它的阶段性。因此,在中国现在的课题被定为是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与现代化(见前面所示的天儿慧著作第五章)。这种有意识的“资本主义化”,只要是与历史的要求紧紧相适应,那么,现在的政权将会安定地维持下去。无论如何,虽然他们是“社会主义”政权,或者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化”才被稳定地向前推进着。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中国才存在着这样的“社会主义”。

## 越南与北韩

与中国同样，越南也是在执政党的意识下推进“资本主义化”的。越南的经济改革始于1986年，无疑是晚于中国了。但是，①在其南部地区，在十几年前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熟知资本主义机制的国民很多。②现政权的领导阶层的不少人出身于南部。③特别是越南式的“万元户”的农民正加速其资本积蓄，在那里自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形成。④在工业部门，1989年所有的国有企业均被赋予了独立核算的完全的自主权，价格管制已经解除。⑤欧洲各国加上亚洲四小龙、东盟、日本的投资急速增加，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也日益向前推进，从这些方面看，越南的改革前景是光明的。从而，我们可以预见，在越南，在现政权之下的资本主义会是稳步地前进的。

经济改革的动向彻底落后的是北韩。北韩在金日成军事警察式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上动员的成功（这与南韩的军事对峙有关）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对经济改革还没有热情。当然，近年也在期待着日本政府的援助，或是已经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摸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金日成思想”与经济改革的思维（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承认，对资本主义的承认）无法相容。例如，在引进外资中，并没有从外资中排除掉南韩资本的理论，如果外资引进被允许，将不得不承认南韩的体制优于北韩的体制。从而北韩现政权并不期待资本主义化。这个结局引起现政权崩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朝鲜半岛北部的资本主义化，其路程可以想像是艰难的。

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各国之间有所差异，但作为全体，“社会主义”和全面资本主义化已不可避免。这个变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正在作为不可缺少的课题被向前推进着。从而，这样的“社会主义”确实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课题推进了资本主义。下一章，让我们做进一步的、理论上的思考。

第1表 蘇聯的合作社規模和人均販賣額

(1990年1月數值)

	合作社數 (千社)	運作中的每個 合作社職員數	職員每人年 平均販賣額
全蘇聯合計	193.4	25.1人	8320 盧布
大衆消費品生產	33.3	23.5	8959
飲食業	5.6	9.5	9485
商業	1.2	11.9	29000
經紀業	6.4	10.6	26212
生活服務	33.0	17.2	5778
第2次原料收集加工	3.2	28.9	10082
建設(除生活服務)	38.7	39.2	7982
建設関連的設計			
調查研究・計画設計	3.1	36.9	6101
軟件開發・情報服務	10.4	30.8	9851
農業(飼養、育肥、養魚、 青菜、種花等)	8.4	11.8	6160
美術・設計	3.3	18.5	4690
醫療服務	4.5	16.5	5211
旅行・娛樂	2.6	20.5	5062
其他	39.3	26.1	8629

資料來源：西岡俊哲“蘇聯的個人經營和合作社”《阪南論集、社会科学版》

第26卷第1号、1990年、48頁。

## 2. 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之路

### 列宁有意发展资本主义

如前章所述，现在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作为历史的进步正在被推进，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正在有意识地进行着。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自我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事物”，因此正在将资本主义化自觉地作为自己的课题。实际上，这种自觉性在革命完成后的列宁那里早已存在过。这件事先让我们来确认一下。

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便将经济建设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并煞费苦心地想为社会经济制度引进“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最近在学术界正在被重新评价。例如，列宁在1921年10月的论文《十月革命四周年寄语》（《列宁选集10卷》，大月书店出版，1971年、第10卷、233页，日文全集版、第33卷44～45页）中曾有如下论述。

“我们在小农的国度里，用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命令，可以将生产物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进行共产主义式的组合，与其说这是我们期待的，不如说这是不经思索的预想也许更正确。实际生活显示了我们的失误。一系列的过渡阶段是必要的。即为了走向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标做长期的准备，那么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并不是直接地以热情，而是借助于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立足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关心，经济计算，在小农的国度里首先去努力建设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如果不这样做，各位将无法接近共产主义。

在这里，列宁不仅对革命后的俄国想一举进行社会主义化作了坦率的反省，而且直言了在小农的国度，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建设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需要长时间的。

但是，在这里，列宁规定了作为重点的“资本主义”的理想状况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这一点多少带有其独特的内容。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什么样的具体的经济制度被描述了呢？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同年4月的《关于粮食税》的论文中揭示了四个具体内容（同前书，第10卷，日文全集版，第32卷）。

即，①给大资本以权力，使其与政权协力。②小工业的合作组合化。③与商业资本进行的国家交易。④国有财产向资本家的租赁。从国家并不是直接给资本家“权利”而是给其予“方便”的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汇被使用了。如果

是这样，我们可将其本质理解为“用国家来促进资本家的事业”，即“由国家来进行的资本主义化”。这与《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有其相同之处的。

### 返回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论

《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论大约有如下内容。即：资本从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使自己增值，这个“资本”最初是如何被积累的呢？当然，优秀并且勤奋的企业家“正当地”积累起来的资金是其中之一的源泉。但是，多数的场合偶然发生的生产物价格的上升和国家的保护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资本必有其原来的“根据自己的劳动而来”的清白。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的正是《资本论》。

事实上，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后起的德国的关税保护政策及国家工业化政策正是其中的典型，这种“自上而来”的工业化从日本明治时代的殖产兴业到二战战败后的倾斜生产方式也曾是主流。另外，关税保护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均可见到，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的“独裁开发”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主张，即，就连最“自主的”资本主义的英国也存在着诸多的“幸运”与国家的介入。

英国的“自主的”资本主义是在13—16世纪和18—19世纪，经过两次的圈地运动从农村中产生的。这两次资本·劳资关系产生的波浪带来了羊毛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急速上升的“幸运”。特别是第2次运动，政府的强制是其决定性的杠杆。从而，在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即资本·劳资关系产生的初期，是采取了国家权力上的促进政策的。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完全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的恩赐。在新的生产关系兴起的时期，生产力上的更加优秀的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前述的“幸运”的生产物价格的高涨必是国家保护政策的结果（当然来自保护的情形也存在）。依靠“纯粹的经济上的原始动力”（《资本论》）来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的。就连列宁也曾希望过那种“非国家资本主义式的”、能够让“自下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所期待的“商业自由化”和用“粮食税”来使小农经济得以存在。因此，问题的核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时代，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政策与自下而来的产生哪一个更被期待的问题。



## 从列宁到斯大林

列宁是明确地将自上而来的推进政策放在重点的。在他的《关于粮食税》一文中，有如下的概述。即：为了削除残存的宗法式的经济体制。用“商业自由化”和“粮食税”来培育个体农民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为了避开他们对政权的威胁以及进一步地引导经济经济社会制度的发展(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苏维埃政权必须与国家资本主义(大资本)建立同盟。进而列宁又做了如下的论述(同前书，第10卷，189页，日文版全集第32卷，372页)。

(与国家资本主义同盟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用发展生产力或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大生产量的形式来获取利益的。假如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森林，可我们无法全部开采它们，因为机械、粮食运输等不充足。相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开发也没有顺利地进行。对大企业利用的失败或是不充分，正在加强着小所有者的自然产生和在所有地方的表现。农民经济的弱化及生产力的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依赖的衰落、盗窃，大量的小规模的投机等等正是这些表现。

从列宁的这些主张中我们感觉到，一是如果做得不成功，政权被颠覆，即政治上的不安定性；二是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扩大以大工业为中心的生产力，即紧迫感。总而言之，这种紧迫感唤起了对小农的警戒，也选择了国家对大工业的支持。其结果是对自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法做出期待，只得选择了对国家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的期待。

笔者认为，当初没能够选择自下而来的对企业家的培育是成为今天企业家不足的久远的原因。但是70年前的俄国的那个选择决不能说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列宁是在社会主义者当政的政权下培养“资本主义”的最早的人物。另外，不仅仅限于俄国，在后起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国家”的主导权是普通的法则。

勿庸赘言，先进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对的，自主的，“自下而来”的，而后起的德国、日本则是国家主义式的自上而来的。这与前述的情形的是是一致的。从而，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技高一筹的“独裁开发”的形式也是可以依此被理解了吧！总之，在落后的国度里，越是将工业化定为当务之急，就越无法等待自下而来的发展，从而自上而来的发展越成为不可欠缺的东西。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一般的规律。

事实上，在苏联，在列宁死后的斯大林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化”(如此称呼斯大林体制的理由请见下节)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既定的经济指标之内取得了飞跃的成功。以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目标的列宁也曾经设定过“国家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课题，并且想定这个“社会主义”应该是集权的、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连贯性。重要的是，同为某种架构之内的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斯大林的集权经济都曾推动了后进国的俄国的经济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停滞”其实仅仅是这10年，20年的事情，斯大林使俄国出现未曾有的大跃进（农业部门除外）可以从图一中看到。

对斯大林做如此的评价也许会使读者感到厌恶。实际上，笔者本人也未曾想过斯大林曾经为小规模经营者开辟过任何道路，并且也不敢对斯大林众多的非人道的行径有任何拥护。问题在于后人对以上这些问题做错误的表述会使想当然的政治家实行想当然的政治。即作为历史的规律，工业化的初期被认为通常是国家主义的集权政治（不仅苏联，日本、德国也如此）。现代人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太容易了。但是，在斯大林时代出现了未曾有的高成长，无视这种经济背景将无法解释斯大林政权的长时间存在。

### 再评罗斯托理论

在回顾苏联经济史的时候，笔者认为，在战争和被世界包围的环境中，急速实施工业化的列宁与斯大林的国家主义是相对有价值的，而将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再倒退回到“国家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以后的做法则是问题太多了。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意义则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将焦点对准“历史阶段”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1959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诸阶段》一书。

罗斯托认为，历史一般要经过以下五个阶段：即①传统社会，②起飞初期，③起飞期，④成熟期，⑤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罗斯托将“社会主义”定为“过渡时期的病态”。这一点虽然欠正确，但是他认为第②、③和④阶段（所有的社会都要经过）是完成历史课题的形态，这一点则是有意义的。例如，罗斯托曾有过如下的论述：

“现在的苏维埃联邦（1950年代后期的苏联，即赫鲁晓夫时代——笔者注）已是对高度在大众消费时代做好了技术准备的社会。劳动力的教育与训练从结构上也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个社会正在焦急不耐烦地等待着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已由对文学、政治、住宅和耐久消费品所提出的需求而证明。但是，现在的政权正在全力阻止这个趋势，年中收入的庞大的增加额被控制住，并转向军事目的或是投资。

从成长阶段论的角度出发，俄国是想通过延缓或制止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从而将其经济成果变成对世界支配的力量。即俄国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共产主义体制在近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它只适用于成长问题的供给面。也许可以说是适用于起飞阶段。……一旦共产主义彻底地支配了全体社会，即象斯大林所显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想将社会从起飞阶段推进到工业化的成熟阶段的。但是在本质上，在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共产主义是被认为不断地衰弱的”（木村健康等译，宝石社出版，1961年，178~179页）。

读以上这段文字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罗斯托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与本来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做出区别。在这里，罗斯托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不适合历史发展的第⑤阶段，即“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确实，在这一点上，罗斯托预言“社会主义”在将来会失败，所以，罗斯托本人也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罗斯托的预言是完全被验证了。我们虽然不认为这种体制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已经主张了这种集权制并没有培育出企业家，并且还因之带来了生产活动的失败。事实上，罗斯托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提出了与此类似的主张。

但是，从罗斯托以上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主张，即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也适用于工业化的起飞和成熟阶段。在这一点上，罗斯托不单纯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罗斯托是对现存体制以冷静的目光相看待的人物，并对某些地方由斯大林体制所创造的“成熟社会”以及斯大林时代广范围的工业化进展做出了正确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带有相当的唯物论性质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斯托理论是彻底否定的。因为如果认同罗斯托理论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否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罗斯托的反驳，是将前提定在了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从而，当幻想被打破，在规定新理论的时候，本书有必要也应该对罗斯托理论进行再次正确的评价。

话归正传，罗斯托为何认为这种体制适用于起飞和成熟阶段呢？让我们再次引用一下罗斯托的论述。

“在起飞还没有完成，经济、政治、社会等等还没有巩固的混乱的场合，……在这种背景之中，中央集权化了的独裁体制作为走向起飞和成熟阶段的先决条件，

即有效的近代的国家组织应该被提供。……”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在从传统社会向前推进的时候，并不是使社会走向更加成熟的国家组织的唯一形态。共产主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马志尼的土耳其革命如出一辙。在没有创造出有实力的企业家性质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的指导者之间的意见也未一致的社会里，这只不过是带来成长过程并使其保持一段时间的一种非人道的政治组织形态(同前书220~221页)”。

在这里，这种体制作为“适用”的条件被这样规定了。因为①政治的不安定性；②企业家的不足，反过来说在这两个困难之下要想起飞和走向成熟，中央集权化独裁体制是有效的。如果是这样，前述的列宁所面临的两个条件，即政治的不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紧急性(企业家不足的时候所带来的紧急性)确实是罗斯托所说的适用于集权经济的条件。所以，在此，罗斯托与列宁的认识是一致的。罗斯托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是非人道的表达虽然不受欢迎(或者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有其人道的一面)，但是罗斯托认为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列宁与斯大林所采取的集权制是有必要的。

或者可以这样说，对于罗斯托来说，列宁、斯大林不仅与土耳其的马志尼完全一样，而且与“殖产兴业”时期的日本的国家官僚、19世纪末的德国的俾斯麦也完全相同。笔者甚至认为还应该包括到二战之前的日本和德国以及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与其说那种“社会主义”因为其为“社会主义”而采取了集权制，倒不如说因为其为“过渡时期”而采取了集权制。因此，社会主义的悲剧实际上是过渡期“集权社会主义”的悲剧。并不是因为其为“社会主义”而引起的悲剧，悲剧是因为集权制所引起的。总之，这个悲剧并非“社会主义自身的悲剧”，而是“过渡期的悲剧”。

### “集权”是带来生产性的条件

以上“悲剧”这个字眼也许使用得太多了一些。但是以上叙述的中心问题是，即使是罗斯托的理论也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集权制是有效的，并且是在两个条件之下。

但是在两个条件之中，政治的不安定性一般会随着经济成长与国民生活的安定而被排除，所以更加实质性的条件则是经济建设的紧急性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紧急的经济建设”之中，国家的介入会“有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联着前面已经提及到的企业家阶级的成熟程度。

这里提及的必须加紧建设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大工业，在这个大工业中，需要有组织地指挥庞大的资金和数百、数千的劳动者的企业家群体。但是，通常在资本主义初期，即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落后国家，这样的企业家没有充足的资金，另外，对数百、数千劳动者的指挥能力也还没有养成。于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将其自身筹集到的资金投资于工业或是融资给(大)企业家是必要的。具体的，现实的形态有日本“殖产兴业”时的官有产业的处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诸政策，或者是国家对企业都承担费用的“国有化”(这个“国有化”则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例如，日本的原国有铁道)。

另外，企业家阶级对劳动者管理能力的不足则由国家来用以下的形式补足了。例如，对于企业内的劳动者的罢工可以派警察去镇压(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常事)，或者对劳动者与劳动运动规定诸多的法规。这些加强了国家对企业的支援，另外，也强化了国家对个人(劳动者)的制约力。这种关系归纳起来如第2图所示。

资本主义在未成熟的阶段，即劳资关系未发达阶段，企业家对个人则无法实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企业家对个人的指挥能力极为软弱。另外，在管理劳动者方面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充足。在这个时期，企业对个人指挥能力的软弱性有必要用国家对个人的制约力来作补充。总之，企业家对个人的管理能力的有无是关键性东西。

这样的“国家主义”的最高形态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型的完全中央集权制经济。当然，这时期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是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控制着工厂，即行政上的特权阶级。因为他们是工厂的管理者，尽管要求他们应具备管理众多劳动者的能力，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实在低下。这种能力的低下(因之而来的工厂内劳资关系的松散)，在集权经济下被进一步助长。在革命完成初期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后这个低下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于是，因为无法将工厂委托给这些经营者们，所以国家有必要对企业直接指示。或者用党国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来补充对劳动者的管理。在不同的场合，也许会为了刺激经济建设采取教育或是动员群众等手段。这是国家对个人加强控制的一个手段。所以，尽管有些差异，但第2图所显示的东西在日本、德国、发展中国家以及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里，不管是资本主义式的国家介入，还是社会主义式的国家介入是有其共同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介入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使现实认识更加混乱了。

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在以上那样的企业家阶级还没有成熟的阶段下的国家介入的必要性与成熟后阶段的国家介入的不必要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无须国家的援助也能筹集到资金的时候则不需要国家介入，同时在企业有能力对丁会有效管理的阶段，压制劳动运动的法规也未必需要。例如，在当今的日本，选举运动中众

多的保守票并不是用行政方法(例如田中角荣型的到处塞钱的行政),而是靠协调的劳动运动来确保住的。另外,80年代前半期,与劳动者保护立法的加强相反,个别企业内的劳动时间延长等资本的专制却被强化了。这显示着对劳动者的管理已不必要由国家介入,用企业内部的平衡关系就可以解决了。另外,企业在发展公共事业方面的能力正在养成,国家以公共事业作为目标的必要性正在减弱。事实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发展以及民营化等的进展里也可以看出。

### “计划”不是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做如下的表述,即在未成熟的社会里,国家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社会成熟化之后,国家是不必要的。总之,在历史的大局中,国家将变得越来越小。

这个长期的展望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国家的消亡”的命题是一致的。这个命题不是“国家的废除”,在“国家消亡”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但是,读者对这样的理论上的归纳也许不能接受,因为对“社会主义即是计划经济”这个基本的社会主义观来说,上述的思考正好相反。

象在前言部分所提及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由劳资关系和市场机制被定义着。市场机制的废除,即实行集权经济化则意味着劳资关系的自动废除。确实,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正是沿着这种思考实行了集权经济化,并且因之而来的是“普通的资本家”,即私人资本家被废除了。

但是,废除了私人资本并不意味着废除特权阶级,只是使无能的政客们变成工厂的管理者更加制度化了。当然,因为“管理的松散”缓和了对劳动的专制指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工人们有利”。但是这造成了全体国民都松散了的社会,从而丝毫发挥不了劳动的积极性。这并不是企业家们付出脑力、劳动者付出了体力的资本主义,这只能形成企业家(工厂的管理者们)与劳动者们谁都不愿参与劳动的社会。

从而,我们必须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此,需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即①劳资关系与②市场机制之间的关



系。如果让我们先叙述这个结论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定义是①而不是②，②只是最一般的条件而已。在此让我们对这问题做出一些说明。

首先，关于①和②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存在着②而未必存在着①。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在“仅有个人经营的市场”中，劳资关系是尚未存在的。亦即有②不一定有①。明确这二者的关系是必要的。

当然，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连。在仅有个人经营的经济中，只要是在市场之中运营，必须存在着经营的成败，成功者伴随着自己经营规模的扩大迟早要雇用劳动力，其结果必然出现资本、劳资关系。即“市场”通过竞争的强制力来决定着劳资关系。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发展的过程。在这里“市场”是劳资关系的先决条件。

但是，①与②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没有市场也可以有劳资关系。例如，国家直接命令某人为资本家，某人为劳动力，通过这种强制指定也可创造出劳资关系。这种现象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与日本殖产兴业时期的处理官有产业的做法中已有存在。

当然，在这种“自上而来的劳资关系的创立”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能否选择或培养有能力的企业家等等。进而，可以说，原始积累在市场机制没有全面化的前提下是无法形成的，市场与劳资关系之间是密切而不可割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正是这样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尽管可以理解以往对①和无②区别的议论，但是对二者还应该做出区别为好。另外，后者的②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定义，只是其条件而已。在此，与之相关连，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以往的争论带有这样的意思，也就是废除市场，实行国有化，废除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产生。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何为“所有”？其实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所有”的实质是指对所有物的使用握有决定权（根据置盐信雄氏的争论）。即被个人占有着的生产手段的实质应是由个人来垄断着的生产手段的使用权。在此，形式上的所有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形式，由谁来占有决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没有形式上的所有，但掌握着生产决定权的负责人实质一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即“资本家”。问题还在于想保留“个人所有”，但却很难保存，从而使实质上的“决定权的垄断”存在了下来（例如原有的社会主义的场合）。从而，我们必须修正拘于“所有”这个概念上的以往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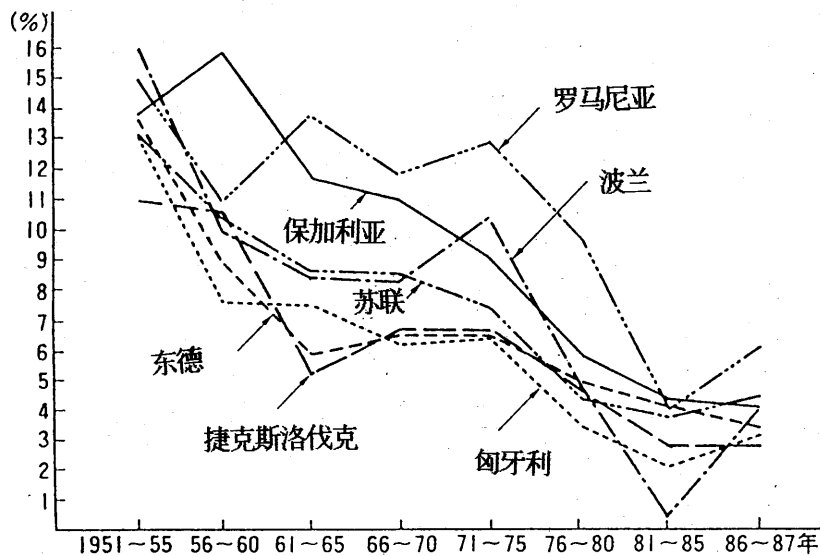
换言之，“所有”本身并非问题之所在，谁来握有决定权则是问题的本质。“所有”只不过是左右决定权的一个条件而已。例如，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未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所有者”握有生产决定权从而可以对劳动者实行专制的指挥。在这里，“所有”作为一个条件，体现着它对劳动的专制性的指挥（市民革命中对“所有的绝对性”的主张也是因此由法律而确定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个条件才能带来劳资关系。例如，经理或是负责人是由选举而产生的，被选出者则可以根据“因为你们选择了我，所以就应该听我指挥”这种心理来决定自己的指挥权。在这里，作为指挥权的条件，“民主主义”被体现着。即专制的指挥权在各种条件之下均可成立。

或者尽管不是这样，股份制的诞生（或是由大众存款而促进资金循环的银行制度）也可使一部分管理者即使没有对生产手段进行私人占有却握有其支配权。在这个历史阶段，个人所有并不影响着劳资关系的形成。反言之，即使不必对劳动者实行低工资制，让他们也持股（或是在银行存款），也丝毫不会削弱资本的专制指挥。即“所有”问题并不是两种体制的分歧点，中心问题则是对劳动的专制指挥（例如日本社会的劳动者因疲劳过度而死亡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股份制已经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的这个显著问题引起重视（勿庸赘言，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是这样的时代。在马克思的时代，“所有”问题是作为两体制的分歧点而存在着的）。

象我们前面讲到的，市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而已一样，“所有”也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根据这样的理论上的整理，我们可以超越只关心所有制变革，即实行国有化从而忘掉了劳资关系的变革的争论，同时也可以摆脱只关心废除市场，即实行集权化从而忘掉了工厂内劳资关系的争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换并不是由国有化、废除市场、实行集权制等来决定，而是始自于对劳资关系的变革，即改变对劳动的专制性的指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个新的思考作一下归纳，即集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工业化初期阶段或仅仅是资本积累阶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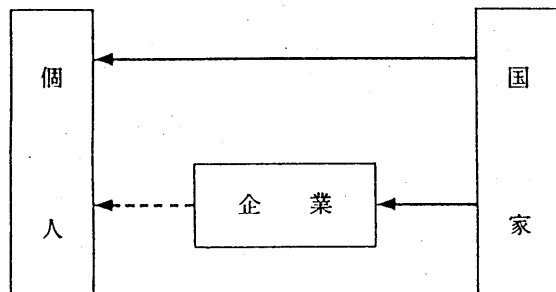
第1图 社会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注释：罗马尼亚1981-85, 86-87年的数值是商品生产额，参见《共产圈各国的统计年报》。

资料来源：沟端佐登史论文“思考徘徊中的现代社会主义”（林、大西、佐中等合编的《新编现代社会经济》，昭和堂出版，1991年）。

第2图 “国家主义”经济制度的图解



### 3. 作为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

####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

以上我们看到了以往的“社会主义”并非本来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它只不过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随处可见的一种集权制度而已。从而，一种新的理论上的架构应该被提出。仅仅是这样，对于我们这个理论上的整理也许会有反论。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即这个理论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考方法之上，对某些问题用本质性的水准来论证。这个课题被留下来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思考方法”到底是什么？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数目庞大，它的命题也为数众多。进而，那些经典中所论述的东西与我们这个新理论架构之间存在着一些大的分歧（例如，列宁和马克思对“国有化”的期待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当我们对某某主义的思考方法做出一些论述的时候，未必能够完全包含它们所主张的全部细节。既然不是这样，各论者的主张在细微之处就会存在着无限的差别。其结果，能被称作某某主义的完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问题必须始于将思考方法的基本内容与其延伸部分区别开来。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考方法在何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列举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如下的两个内容。①剩余价值学说，②唯物论的历史观。这应该是最合理的出发点。关于这两点内容，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思考。

即剩余价值学说在《资本论》中已多有论述，并且阐明，在自由的商品交易—等价交换的社会关系之中也存在着剩余价值产生的机制。进而，核心内容是即使在企业与工厂之间，劳动力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企业对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实行“不支付”，另外，为了强制（“工人阶级不仅在生活上的各种欲望被狭窄地限定住，还被要求付出更多的劳动。”参照《资本论》日文版全集，第三卷，407页）推行这个“不支付”，对劳动力或者工厂的指挥权被行使了。从而，这里的中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上的内容是劳资关系，其本质性的东西在于资本对劳动的专制指挥，根据这个意义，我们首先可以确认我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定义（从劳资关系上的定义）的正当性。

或者这个问题可以做如下的表述。即“资本主义”的政治架构由市民革命来

完成了，相对于国家，个人和企业的自由被确保了。但是，相对于企业来说，个人(工人)的自由未被保障。也就是说，自由在工厂面前呆若木鸡。象前节的第2图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如此的反论定会出现。但是，在第2图中，国家对个人、国家对企业实行强制的目的在于使企业对个人(工人)实行专制。另外，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成熟可以制止国家对个人、国家对企业的专制。即作为资本主义本身的课题，它握有使国家走向终焉的力量(这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是，企业对个人的专制，在资本主义那里是无法废止的。再次抓住作为资本主义的中心内容的“资本的专制”问题，并且从国家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关连角度来探讨则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主张。这些决不是仅在“所有”问题上付出关心的分析方法，也决不是根据市场的有无来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析方法。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中心内容，即唯物论历史观不仅在《资本论》这样的书籍中没有提及，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轻视了。或者，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崩溃现象中，来自半途而废的理解，草率地认为唯物史观的妥当性已经消亡了。但是，笔者以为，当前必要的事情并不是忘掉唯物史观，而是选择并深入研究其本质部分。那么，唯物史观的本质部分到底是什么？它的中心主张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对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概略地给出了如下的论述。即：①“生产力→上层建筑→社会各种意义形态”的关系，或者上层建筑中包含着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

②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另外，“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所形成的社会整体作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发展则是不可回避的法则。资本主义是最后的阶级社会，在其之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到来。

或者，进一步简化这两点，我们可以归纳出①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的决定性和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我们应该从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出发来讨论以往的“社会主义”。若从这个架构出发，再次考察正在突飞猛进地资本主义化的以往的“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必然化的生产力基础？或者，因此没有例外地，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将资本主义化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机械化大工业，在这种生产力之上只能是资本主义。或者，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以往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最可以从法则上来理解。显而易见，以机械大工业为基础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且现实中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化。使大工业基础成为前提的是集权经济，所以，以往的“社会主义”集权经济成功本身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从而，所谓“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即大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时期而已。至少，只要忠实于历史唯物论，在讨论社会体制问题时，生产力的性质必须特定化，生产力的最关键问题是机械化大工业这个特殊的质的问题。

###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机械化大工业为什么只容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仅仅滥用从机械化大工业到资本主义这个规律，只能成为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我们自身必须对这个规律性进行更有理由的解释。这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所无视的课题。即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解释在机械化大工业之下为何资本主义成了必然的东西，从而没能说明资本主义有历史的必然性。其结果，资本主义是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错误的体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心理动摇，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充分所致。这也是对于“每个生产力阶段所对应的体制是不同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理解不足所致。

让我们将问题集中于机械化大工业，并考察这个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思考机械化大工业这个生产力的性格，我们认为对比着前面的生产方式，即封建制的生产力基础将是有益的。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其生产物的质和量取决于手工艺人的熟练程度。这样生产力的基础带来了师徒制度和上下级的身份制度。另外，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也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特征。在“熟练即是生产力的核心”的情况下，为了再生产，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被调整了。这确实表明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机械化大工业全然不需要这种熟练。在那里，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样好性能的产品并不依存于劳动者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而是依赖于科学体化物的机械体系，即资本设备和驱动这些设备的企业组织。一旦生产力的质表现为机械，那么，人类自身就变成了机械的单纯的附属物了（《共产党宣言》）。



不仅如此，从机械的生产力中被排除出来的单纯劳动对资本的制约关系减弱了，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劳动被强制着。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的利润带来了资本，即机械的增殖，也带来了机械的生产力的扩大，即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就是这样被实现的。这个社会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为残酷的。另外，剩余价值的过分榨取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是极不公正的。但是问题在于若是没有这样的“强制榨取”，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则不会发展，这是由“机器的生产力”时代的生产力的历史性质决定的。“资本(机器)的增殖”作为其自身，从工人那里被疏远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最必要的(历史性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生产力发展。所以，如果是主张强制榨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么，支撑着这种行为的国家制度将被调整。从这个意义讲，这确实可以称作机器，即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们所支配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定义中，如果资本的所有者是个人或者是国家，那么，前者可以称之为“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支配社会)后者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支配社会)。前者是普通的资本主义，后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开发独裁的国家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后者也包括以往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有如下的论述：“向股份制转化和向国家所有转化都不是废除生产力所带有的资本”(日文版全集，第220卷，287页)。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当然，这样的资本主义毫无人情味。但是，只要是在阶级社会(即阶级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历史性的合理的(按黑格尔的意思为合理性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的，只有这个才是能够存在的社会体制。对于大工业阶段这样的强制榨取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想做出整理。

关于这一点，首先想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自身是进步的、积极的，但是，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强制榨取”的无慈悲性是丝毫不能否认的。例如，让我们来看战后急速发展的日本经济，仅用蔷薇色来描述它，在一部分“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成为时尚，但是，这仅仅是片面的议论。在急速成长的日本经济的背后，劳动条件之恶劣，“过劳死”的社会现象也是随时可见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急速发展的背后也关连着各种各样的残酷的现实。

但是，这样东西正在被正确地认识着，在机器化大工业的时代里，以上的情况并不否认“资本的专制”的不可缺少性。例如，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曾经计划实行泰勒主义，我们对此无法反对。泰勒主义确实是资本主义开发出来的劳务管理

体系，其自身并没有错误。在给定的生产力条件之下，必须问“什么是必要的”。只有这种现实主义才是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大工业中的专制指挥的必要性有如下论述。即，“人类用科学和发明的才能，使自然服从于自己，自然与任何社会组织无关，人类在使用自然力的时候，也使人类自身成了真正的专制的从属物。这意味着废除大工业中的权威的愿望，废除工业自身的愿望，为了返回纺车的时代而废除蒸气纺织工厂的愿望（《关于权威》，日文版全集，第18卷，303页）”。

从而，只要以机器大工业为生产力的基础，即使是以往的社会主义也不可缺少对劳动实行专制的指挥。担任这个历史任务的正是新兴的前进的纯粹的资本家阶级。对以往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的讨论都正在归结于机器大工业中这个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问题上。

####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生产力的人的要素

以上我们看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其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进步的东西。因为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在于机器，所以，人变成了其附属物，劳动者自身的发展被抑止了。但是，这不等于在资本主义之下不需要百姓们作为人的能力，相反，则期待一部分百姓作为资本家来起着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即机器大工业之下必要的人的能力问题的讨论，以下所叙述的内容至关重要。

对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即“资本主义化”来说，最头痛的问题是缺少有自觉性和有能力的资本家，即企业家。这问题在第1章已有详述。这样的资本家阶级能否大量地被确保住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正当性的程度。

例如，当前中国的个人制农业政策产生了大量的被称作为万元户的富有农民。但这同时也是农村的阶层分化政策，这必然产生某种社会分裂。尽管如此，这个政策的推进还是有其理由的。作为这个政策的不利益性的补偿，生产力扩大的效果正在体现着。

一般而言，不仅仅限于现在的万元户，革命完成后的土地改革及刘少奇、邓小平当年培育小经营者的政策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也带来了阶级分化、社会分化的不利后果。即为赚钱而经营和不为赚钱而经营的差别越来越大，这两者的对立的产生将无法避免。从而，这样的政策只有在能弥补其不押的方面的前提下才能被推进。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政策不得不受到限制（大跃进、文革及毛泽东的发

动群众搞生产的运动)。培育小经营者的政策能有多大的有利性? 这取决于自由的企业设立制度在何种程度上被执行, 社会中的积极分子在何种程度、何等范围之内存在着。即, 以上的程度越是广范, 那么培育小经营者的生产力扩大效果也越大, 也越来越能填补一些不利的方面。其结果, 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状况。解放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路线斗争围绕着这个分析是可以解释的。

## 技术与人的历史

从以上可以看出, 重视生产力中的另一个要素, 即人的要素, 不管是在小经营的生产方式还是在机器大工业的历史阶段都是必要的。从而可以将“自然”(包含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与人的二要素的发展史作为整个历史来讨论, 并且因之可以更加阐明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关连关系。

第2表是对这个关系讨论的尝试, 让我们简单地做一下说明(见第2表)

首先是前述的封建的小规模经营。象前面所叙述的那样, 为了“熟练”的再生产必须保持长期的安定关系。为此, 徒弟的人数被师傅们能够传授多少手艺而限制着, 另外, 因为徒弟早晚要成为师傅(如不这样那么师徒关系转化成阶级关系), 所以, 各个领域的经营者的人数被限制着。使这样的各种经营在小规模上能够安定的则是用行会制来划分各自的市场, 这也同时带来了懒惰于经营方面的努力的相反效果。或者, 对这种经营方面做出改善的努力被百姓的人数限制住的情况下, 封建制的市场划分的副作用就超过了它的正面作用。这将要求着作为资本制的所有财产, 自由竞争、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自由的小规模经营\*)。当然, 在竞争中决意要取胜的“生产力的人的条件”, 即“人的生产力”则在这种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标志参见中村哲雄著《奴隶制·农奴制的理论》, 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一九七七年, 以下各\*标志的出处相同)。

在竞争中获胜的经营者逐渐扩大其生产规模, 在“熟练”的再生产逐步解体的状况下, 这些企业在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保持高的生产力。这种“行业间协同的生产力”或者叫做“集团的生产力”将不可缺少。在机器大工业这种新技术条件欠缺的状况下, 要想实现这种集团的生产力则需要的指挥、监督大多数劳动者的“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也是使新的生产编制, 即工厂制手工业能够成立的新的“生产力的人的条件”, 即人的“生产力”。但是, 对这样众多的劳动者进行指挥、监督, 在历史上则是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成立而由机器自身来担

负的，机器使唤着人类的状况在广范围内实现了。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最安定地产生的条件只能是机器大工业。

另一方面，前述的封建制的小规模经营也能在手工艺人熟练的基础上利用劳动手段创造精巧的制品。在劳动手段的质量还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手工艺人的熟练”和再生产体系还不至于出现问题。那个时代形成问题的只是人类以多大的积极性来劳动怎样形成团结起来的集体劳动。

例如，个人从集体中的分离最小限度能够实现的阶段，人身依附关系的维持和再生产则是这种“集体生产力”最易发挥的体制（参见论文“奴隶制大经营”及“家长制的奴隶制”\*）。另外，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分离，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和成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被认可，从而，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被确保，高的生产力也可以实现。这些生产方式的差别及”个人“的产生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劳动积极性这个生产力的人的条件，即人的生产力的发达程度。

进而，在生产力有“人的条件”与“自然的条件”这两者都极不发达的时代，象历史唯物论所讲的那样，剩余生产物是无法出现的。从而，也缺少阶级分化的条件。那个时代，人们只有屈从于自然力。崇拜自然的宗教及宗教的体现物，即祭司作为共同体社会的指导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对于《经济学的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以为，以小规模经营基础的共同体的土地所有转化成了专制君主的私人所有。具体地讲，笔者将其理解为“国家奴隶制”或是“国家农奴制”（参考中村哲雄前面的著作）。作实质上领先于“古代的”乃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未必不存在，在小经营的，共同体式的土地所有的农奴制或是奴隶阶段，如果一些条件存在，那么那种生产方式也可以存在。尽管这样讲马克思所讲的在“古代”之前的一些理由也不是没有的，因为世界上最早的四大发明就采取了这种生产方式。这也是恩格斯所列举的最初的国家出现与“东方的水利灌溉”有关。治水与灌溉是需要专制权力的。确实，在这时产生了最初的阶级社会与国家。在那里，大自然与未成熟的人类所规定的生产方式作为最基本的要素在起作用。

以上，尽管我们还没有走出素描的领域，但是由人类与自然所构成的生产力是如何在各阶段被规定的这一点已经明了地显示出现了。另外，作为机器大工业这种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或是作为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已经显示出现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可以唯物史观地理解当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问题。

第 2 表

基本生产方式	生产的编制	生产力中人的条件	生产力中自然的条件	国家的机能、政策、宗教
原始共产制	原始共同体	在个人水平方面，生产能力还未成熟	劳动手段还没有完全成熟	拜跪于自然力，信仰自然的宗教——祭司是共同的指导者
奴隶制	奴隶制大规模经营及家长式的奴隶制	个人的生产能力还未成熟、存在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小规模的集体劳动的生产力		奴隶主权力的保护政策用宗教进行道德教育
	土地占有的奴隶制（奴隶制小规模经营）	个人为了生产，已经带有创作性（承认土地占有，生产的刺激性已经出现）		封建领主的权力保护政策用宗教进行道德教育
封建制·农奴制	农奴制的小规模经营（农业）	比起奴隶制时代，为了生产，个人更具创造性（事实上的所有权已被承认，生产的刺激性在此基础上扩大）		
	封建式的小规模经营	技能传授式的生产力	微妙的技能上的差别，体现着生产物的质量，劳动手段仅在此基础上成熟	封建性的师傅们的保护政策各种封建性的规范（如行会规则），用宗教进行道德教育
/	国家式的奴隶制及国家式的农奴制		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手段还未完全成熟	恒河、尼罗河、黄河等地的治水灌溉产生了专制（四大文明是其典型的例子）
	个人小规模经济	比起封建制、农奴制时代，为了生产，个人具有创造性，土地私有被承认，一些人已带有“起家兴业”的欲望。	劳动手段已不再是仅仅依赖于手工艺人的熟练程度	私有财产的保护 原始积累的各项政策
（过渡时期）	工厂手工业	一些人的起家兴业欲望加上对劳动的指挥管理能力（对于劳动者来说，人格自立是生产欲望的前提，所以这时只需要较为“和善”的管理能力。	机械及机械体系（肉体劳动被取代）	支援资本对劳动的专制指挥（用工厂法规，学校教育等进行道德教育），并且制定了劳动力保护与培养政策，进而还制定了促进资本积累的政策。
资本制	大工业	管理的中心从劳动指挥走向了“经营”，并且出现了一定的技术人员。		
后资本制 （社会主义）		带有丰富的个性，感性与创造性的人全方位出现。	情报化（非个性的劳动被取代）	劳动指挥，即所有的权力将被废除。

#### 4. 89年和91年为何出现了市民革命

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

象以上所看到的那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带有“前资本主义” (Precapitalism) 的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讲，它带有国家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的性格。并且，正因它的成功，它将不得不转向资本主义。但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特有的现象，论述这个独特的过渡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本章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作为一般论，过渡期的社会里必然伴随着混乱现象，。过渡时期存在着无数的经济制度，因此，在各个经济制度之间将发生不协调的东西。

例如，在比较由共同体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支撑的社会和由个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支配的社会时，前者则由优先于共同复兴的人所组成，后者则由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组成。不管哪一个社会，如果它只是由同一类人所组成的话，那么将不会产生问题。例如，全体成员都为后者的场合，其胜败则不取决于行动方式，在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只归结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但是，当两种类型的人同时存在的场合，情形又是怎样呢？有一种情况可以想定，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对其共有的财产，一部分人优先于共同利益，而一部分只优先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时，后者优先实现自己利益，前者则对后者利己主义行为进行批判。在我们身边，优先考虑家族、村落利益的住在地方上的人与追求个人利益的住在城里的人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

但是，问题在于对于这种社会性的对立我们不能断言谁是恶者。象前边所叙述的那样，每一方的行动方式都可以在其所组成的社会里顺利地运行。将后者说成恶者的时候却不能忽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正在由共同体主义向着个人主义变化这个趋势。后者只不过是对新的人际关系(重视自立的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较早地习惯了而已(只要是所有的人不以相同的速度习惯新的人际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必然产生)。总之，复杂的社会制与人际关系的并存是产生这样分歧的最基本的原因。

中国的“关系社会”与官倒

以上所看到的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是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另外，个



人主义的人际关系是实力主义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独特的社会矛盾的则是中国的“关系社会”。

我们当代的日本人并不认为这种“关系”是好的东西。不管做什么都应该凭自己的实力。而不应依赖于实力者。我们的社会正在向不允许“实力者”的体系转化。奉承于实力者没有意义，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竞争”。相反，现代中国的“特权社会”是绝对的实力社会，所以，人们都热衷于努力去建立“关系网”。归总起来，这显示着新的个人主义即竞争社会对家长制的人身依存社会，即特权社会的矛盾。

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即官倒问题是根源于这种社会制度的。被称作官倒的现象是因付与官僚们以特权而产生的。例如，官僚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物资转给自己或是自己的亲友，这种情况大量地出现着。这表明对于物资来说，行政权太大了，这是在经济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介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即“国家主义的经济制度”下通常发生的事情。实际上，这样的权力腐败现象不仅限于中国，在前苏联、东欧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以上采取基本相同的经济制度的开发独裁的发展中国家(马科斯或全斗焕)里也是习以为常的。

关于官倒问题还必须明确一点，即，产生这种权力的腐败现象的条件之一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定时期的性格所决定的。在物资流向私人的场合，如果不存在倒卖这些到手物资的市场，那些物资充其量仅供自己使用而已(例如齐奥塞斯库和昂奈克的宫殿，勃列日涅夫的外国轿车等)。但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市场正在发达，这些物资可以换回资金，可以增生无限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物资流向私人即使不是强行夺取，是以低于市场价格买入，这个价格之差也可以产生利润。在官方价格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用这种方式，权力者可以得到无限的利益。

从而，市场机制的存在成了(市场价格以下的)官方价格存在的条件，即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条件。也就是，复杂经济制度的并存是助长官倒的机制。

作为这种情况的反映，一些论者认为市场机制的引进是产生官倒的原因，并主张全面返回官方价格的时代。相反，另一些论者则认为应该扫除权力在经济中的介入，取消价格双轨制。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并存实际是有其经济学的背景的。

在这两种主张中，一方是保守派的主张，另一方是激进派的主张。并且二者都有一定根据，是无法两立的主张，甚至导致了非和解的“斗争”。例如，九一

年夏天苏联的政变。过渡期的社会主义的混乱就是带有这样的背景。

这样的非和解的斗争的结局，苏联政变中的激进派取得了胜利，经济改革更加向前。进而，这显示着由市场与国家介入同时并存的局面只有走向市场方向。其结果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将国家资本主义推向了私人资本主义（普通的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这也是在前章看到的总体上法则。当然，这个全面市场化的方向的正确性并不规定其速度与过渡性管理的具体内容。在正确地追寻这个方向的基础上，现在的社会主义各国正在寻求最新的政策运行。

### 与绝对王权斗争的回忆

象以上所看到的那样，权力者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力是出现官倒的温床，并且助长官倒的是与市场制度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与此有完全相同的机制，并且有着斗争历史的则是绝对王权的重商主义。

说到绝对王权下的重商主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繁荣，因为这些公司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获得了急速成长。但是，实际上，这些东印度公司在经济制度上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即国家在制度上规定，除了这些公司，其他的企业不得从事贸易。从而，自由贸易被禁止，这些握有特权的贸易公司扩大着它们的垄断利润。

如果允许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各国输出到东印度的商品的价格也许会降低，另外，来自东印度的商品的国内贩卖价格也可能会降低。反过来说，通过对贸易的限制，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可以用高价贩卖商品。另外，在本国也可以用高价贩卖输入品。总之，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垄断利润是因为国家的介入而开始获得的。

国家为何要对贸易进行限制呢？其理由是贸易垄断利润的大部分被送进了国库。这个垄断利润既然来自国家的介入，那么东印度公司将利润的一部分上交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而，在这里，国家（权力者）与特权的垄断企业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换言之，与不得不用高价来购买输入品的市民之间则变成了对立关系。实际上，反对绝对王权的市民革命、反重商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承担了这个历史课题。面临着与历史上同样的课题，则是反对官倒的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市民。1989年的东欧革命都带有市民革命的性质。

另外，上面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即使不可缺少市民革命，但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其形态也存在着差别。例如，市民革命有如下两种情形，一是对于与国内

封建势力或者一部分特权者相结合的政权的市民革命，另一种是自生的资本的革命。现存的社会主义属于这两种情形。象以往的“社会主义”那样，基本上限制外资的进入，但是，在很多后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起很大作用。所以，这些后进国的资本主义革命，首先将外资进入作为侵略战争来看待（例如前面谈到的89年的东德革命，甚至1945年的日本战败也存在着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国家向自力更生型的资本主义的转化导致了对外资的驱逐和民族民主革命（象中国、古巴、越南、智利、伊朗）。以上这些资本主义化在主体与方法上有些差异，但资本主义化自身的中心意思没有变化。

如上所述，从国家资本主义向普通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是伴随着实质上的困难的。这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过的“市民革命”的课题，也是无法逃脱的课题。这个课题由市民亲手解决。因此，对于现实中的动向，我们应该再度思考历史的运行法则。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动向来看，有人认为马克思学说存在很大缺陷。其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动向正是法则性的历史发展。问题也许是将什么东西来作为法则，并且寻求正确的认识。

## Ⅱ 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资本腐朽化是什么？

在第Ⅱ部分，让我们来讨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讨论的中心内容。因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已，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在第Ⅱ部分里，我们将对此做出具体的素描。

例如，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想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贫富的扩大和劳动强度增大的问题。因此，这个新的体系还不是社会主义，这只是在更高的生产力阶段中开始呈现的历史性课题。笔者认为，在中国，21世纪中期才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因为中国到那时会呈现出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即日本经济现在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现在日本经济，其资本主义以后的特征正在明显化。从而，在第Ⅱ部分里，主要是以现代日本经济为对象来预测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

## 5. “软性化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 新型年轻人摆脱公司的约束

象第I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样，变革中的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劳资关系，但这个根本问题中的变化被隐藏着。在我们所居住的日本，最近，作为资本专制最重要杠杆的“公司主义”和公司共同体意识正在收到严厉的批判。摆脱公司的约束正在向前推进。

但是，摆脱公司的约束，这个新的劳动动向在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未必被更高地评价。因为，走在摆脱公司约束最前沿的新型年轻人们，同时也是摆脱工会的阶层。这种心情笔者是能够理解的。

对于劳动强度过大，以至于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日本的劳资关系而言，从这个最大杠杆的公司主义与共同体意识中摆脱出来，则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对于以新型年轻人为主的这个动向必须加以注目。这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的附属问题，而是对资本支配劳动者问题的打破，是企业社会变革的问题。

首先，来看一看新型年轻人摆脱公司的实际状况。根据雇佣问题研究会1985年的调查，在不满25岁的人中，认为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人只是其他年龄段的三分之一。有近9成的年轻人认为，仅仅是为了工作而活着的人生太没意思了。另外，象第3图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为了公司是否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公司是否可以一个人外出去工作”等问题的回答均是否。从而，这一点作为日本经济成长支柱的崩溃，企业感到危机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中有6成带有转换工作的意识，对于公司的归属意识是淡薄的。这种意识的变化速度是很快的。认为工作就是人生的20岁的年龄段的人，在1967年占50%，1978年降为24%，1980年则急速下降到12%（“关于日本人的职业意识的调查”，1967年，“日本人职业观的调查”，1978年，“日美比较调查”，1980年）。

进而，不仅限于在意识上摆脱公司，在实际行动上，他们也不再是“公司人”了。据前面的雇佣问题研究会的调查，对于“你是否正在作为公司人而生活着”的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35—60岁的人占40%，而25岁以下的人只占16%。对于“你在家是否也从事着公司的工作”的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35—60岁的人占25%，而25岁以下的人只占7%。另外，参加公司的活动或积极参加公司的活动的人中，年轻人仅仅是40岁年龄段的三分之二，相反，不太想参加公司活动的

年轻人则是40岁年龄段的人的1.5倍。与其他的年龄段的人相比，年轻人也不想与上司交往，至少是不太想与上司交往。

所以，经营团体现在正在感到危机。曾几何时，书店的商业书专柜摆满了这方面的书籍，例如，《新型年轻人杀过来了！年轻人人事管理大研究》（扇谷正造著，PHP研究所）、《新型年轻人的录用，教育便览》（清水勤著，朝日新闻社）、《头脑聪明的新型年轻人的操纵法》（守谷雄司著，第一企划出版）、《与新型年轻人的交际方法》（小林克己著，管理出版社）。这些东西充分反映了人事管理对于摆脱公司的年轻人们的苦恼。经营团体甚至组织了专门的研究会，不仅象前述的劳动部所委托的调查，经团连、野村综合研究所也为此不辞辛劳。

都市里的知识青年与阿谀奉承之辈都不是“公司人”

如果象这样讲，也许会立即招至反论。即，即使是新型年轻人，进了公司，其中的很多人则会比老一辈更热衷于阿谀奉承。这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至于新型年轻人中的阿谀奉承之辈是用不公平的方法来对付竞争对手的。因为他们带有这种特征，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未来的想象中的阶层。但是，他们不是曾经担任起经济成长时期的被公司束缚着的前辈们，这一点是不能不看到的。

尽管新型年轻人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从事工作，但他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司，只不过是为了多赚一些钱，使自己生活过得更好而已。这是因为“只为自己考虑”的性格上的东西所决定的。他们自身已不再是为公司而工作了，即他们已经不再是日本的那种作为“公司共同体”的成员了。年轻人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们，如果发现新的，更好的工作，他们会不讲义理与人情，立即调换工作。即使是能容忍这些年轻人的企业，也仅限于企业不得不为这些人提供优厚的条件，使他们觉得这里的工作油水大（只要我们看一看年轻人们的高收入，看一看阿谀奉承所带来经济效益，我们就会明白。将来，伴随着企业成长的不景气，“油水”枯竭的时候，企业的危机感将更加增大）。

新型年轻人所获得的优越条件，还不仅仅限于高收入，我们将注意力不能仅放在这里。例如，对于受欢迎的电子游戏软件的开发者和影视明星，不能认为他们做工作的动机仅仅是为了赚钱。对于他们来说，有来自工作内容自身的动机，对于这些工作的欲望可以被理解为是造就优秀年轻人和使年轻企业家从事新的商业的心理。当然，近年来，DINKS“家族”中职业女性的就业心理，也有这方面

的因素。

对工作产生乐趣的原因大概在于“工作的充实感”，“自己负担自己”，或许也在于人类的最高追求，即“自我实现”吧！关于这一点，岩崎隆冶所转述的法国哲学家罗杰的观点，即“娱乐的要素存在于上层经营者们的工作之中”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岩崎主张，罗杰所说的“竞争”，“偶然”，“模拟”，“目眩”这些娱乐要素在如下的意义上存在于经营者的工作之中（见岩崎隆冶著《工作场所与年轻人》，日本劳动协会出版，1988年，第200至201页）。

- ①现实的工作场所经常是在与同事或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存在。
- ②最关键的决断经常是最后的一赌。
- ③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就象小说那样带有戏剧性。
- ④成功时的感慨和兴奋与失败时的绝望超过麻药和酒精。
- ⑤事业急速展开时的心情是极为快活的。

以上这些要素如果存在于工作之中，那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新型年轻人对“工作”的追求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为现代新型年轻人自我实现的表现，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热衷于电子计算机和汽车的状况。新型年轻人热衷于计算机的动机在于通过对物的驱动比起任何东西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并且，与个人的能力无法左右的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相比，计算机系统则可以预测，可以控制。这也是新型年轻人对于破除来自外部的制约，表现自己能力，实现自我的一种追求。其实，新型年轻人们喜欢购买跑得快的汽车也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变化的实质是“劳资关系”的变革

新型年轻人这种自我实现的要求带有以下这样决定性的意义。即，本书中多次重复过的“资本主义的废除”就是“劳资关系的废除”。劳资关系的废除可以使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来实现自我。

马克思在区别动物与人类的劳动的本质时曾经有过如下阐述，马克思说，当我们想定只有人类具备的东西是劳动的实质的时候。蜘蛛可以象织布匠那样操作，蜜蜂所做的蜂房又足可以使建筑家们面红耳赤。但是，尽管是水平最低的建筑家也胜过最有水平的蜜蜂，因为，建筑家们在建房子之前，脑子里已经有了构思。在劳动过程的始终已经存在着劳动者的想象了，即，带有观念性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资本论》，第一卷，日文版全集，234页）。

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与蜜蜂劳动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在心目中想定的东西有没有被实现。蜜蜂只不过是本能地筑造蜂房，而人类则不是这样。在人类所做的东西中，有着人类自身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可以说是人类内心世界的表现，即“自我实现”。

但是，这样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的专制”，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之下，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是分离的。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指挥、监督的是资本家，被迫从事精神与肉体劳动的则是工人们。从而，新型年轻人所追求的自身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实现。或者反过来说，这个实现实质上是体制的转换。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将体制转换描绘成夺取政权，或是实行国有化。对于每一个劳动者而言，关键的是由于体制转换，自己的劳动产生了变化没有。政权由谁手里转到谁手里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劳动不是成为他人的劳动，而是真正成为自己的劳动。因此，权力的改变，或者企业的国有化，其有效性都只是一时的。

用这样的眼光再一次看我们生活中的社会时，这种“自我实现”正在表现出能够部分地被实现的趋势。例如，企业方面已经在呼吁，未来的时代将不是灭私奉献的时代，而是活私奉公的时代（樱井修，住友银行总经理之语），先例、常识及管理的规则将被破除，豁达将成为人们行动的原理（饭田亮，赛克姆公司总经理之语）。这里所讲的“活私”，“豁达”意味着每个劳动者希望自己的发明创造能被利用，至少意味着劳动者们在期待着“精神劳动”。另外，企业组织自身也将下放权力，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向“脱管理”的方面发展。因为这种尝试已经开始。将来，分权化，分公司化将会被认为是一种趋势。

象前边所看到的那样，从抹杀个性的“灭私奉公”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活私奉公”的转化意味着如下的内容，即，公司的状况将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向的关系变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方面关系。这就是对精神劳动的垄断的废除。赛克姆公司总经理曾对职员强调，要废除管理的生硬之处。如果生硬的管理被废除，则意味着该公司将从资本制中脱离出来，这个变化将有重大意义。

#### 变化中的生产力的基础

当然，上述的变化并不是公司自发地进行的。勿用置疑，这种自我实现的要求被推向广泛与高度则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条件，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自身



改革。问题在于这种变化有其必然的、更客观的背景。象汽车、西服之类的产品，造型与式样设计等附加价值所占的比率正在上升，在今天这种软性化、高附加价值化的时代里(参照第5图)，在企业活动中，劳动者的建议所占的比率正在提高。所以，企业内劳动编制向“活私”、“豁达”方向的转化也是紧迫问题。

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足的时代”正在向“过剩的时代”转化，衣食住充足之后，消费品便不仅限于实用性与效率性。如果说需要气氛与感觉是现代社会的活，那么，不管是家俱、汽车、衣服等物品，任何东西若是没有一种感觉便没有销路。例如，1983年，三菱电机成立的学生监控器组织，现在就演变成了专门性的设计队伍。这个例子与上述的大背景的变化是相关的。

这种变化不仅限于厂商的产品开发部门，百货店、商场、进口海外商品、产品的陈列等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女大学毕业生们活跃的身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变化的量，而是其所带有的意义。即，被追求的生产物的质的变化正在使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产生着变化。

如果从生产力的基础来论述这个问题，将会是如下的情景。即，机器是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人作为生产力的时代正在到来。生产那些轻的、重的、薄的、厚的等数量上的东西是机器最拿手的，但是生产那些美观的、精致、有意思的、有感觉的东西则只能是凭人类的智慧。在当今，后者已是商品不可缺少的部分，从而，人类的附加价值，软性化的作用正是决定性的东西。

这样的人的生产力与封建时代手工艺人的手艺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手工艺人的手艺完全被机器取代了。从而，现在正在重新需要的人的生产力则是机器根本无法替代的。设想与设计是机器所不能为之的。

或者可以做如下解释。即：如果有A、B两个人，当他们二人的思考过程在本质上有相同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思考过程可以由计算机来代替。但是，计算机无法代替的人的生产力现在正在被追求着，这就是当只有A、或者只有B能够做出思考、提出新建议的时候。这实质也表明，超越合理性、即理性(rationality)的个性或者感性正在成为被追求的对象。在这个软性化社会中最活跃的是年轻人和女性。另外，劳动开始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发挥，人类劳动真正地实现着自我。因此，我们称以上的生产力为“个性生产力”。

但是，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加以注意，那就是，在向这个“个性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里，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机器了。如前所述，这个新的生产力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当今的时代并不是超脱工业化的时候，而

是超脱工业化社会的时代。当然，被称作为英国病的现象也是前者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不需要机器了。

### 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转换是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的。在以机器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劳动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对资本失去了交涉能力，只得屈服于低工资与长时间的劳动条件中。但是，在追求更充足的人的能力的时代里，劳动条件已不允许低下的生产力。即：问题已上升到生产力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人还是在于机器的高度上。如果是前者，那么，与资本增值相符合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将被创造；反过来，如果是向后者迈进的今天的情况，那么，人作为劳动的主人公的社会将被追求。

从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劳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当我们分析当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情况时，我们会看出，新闻节目的视听率并不取决于每个电视广播公司的机器与技术，而是取决于每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的个性。我们不喜欢看NHK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而喜欢看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比起NHK来，朝日电视台对言论的管制较少，即对劳动的专制指挥较少，另外，充满人情味，内容丰富的消费生活也被这些劳动者、即播音员们给予了保障。例如，朝日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久米宏常常是畅所欲言，并且，夏季里也能有较长的休暇时间，这些都是其收视率较高的秘密，这也是本质上的劳资关系的转换。

收视率高的原因既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人，那么这样的人如果换工作到其他电视台，那家电视台的收视率也肯定会高，因此，对于这样的人的待遇，包括给予其长时间的假期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另外，有能力的人因为自己认为随时可以调换工作，这种“能力主义”、“个人主义”正在取代爱社精神，这种意识的增长有着重大意义。日本的公司共同体的重要支柱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也已经失去了缓和的余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能力主义式的工资原则正在到来。另外，以工种为单位的横向劳动市场正在形成，在这个市场中，劳动移动正在增大。1987年的就业结构调查表明，换过工作的人数已是上次调查结果的2倍。政府的总务厅也已经彻底地承认了这种劳动市场中的移动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固定了(参照第6、7图)。

每个人的无法替代的有个性的劳动成果，已经使个别企业，即资本难于继续垄断。所以，以往被封锁在公司中的社会劳动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即除了劳动者个人以外，不属于任何人的劳动已经开始出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的社会性质与获取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扬弃”，即“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千真万确的。

确实，人类成为生产力主人公的社会只能是真正的生产力源泉，不在于抽象的企业组织本身，也不在于机器，而在于劳动者。正是因为向这样的一个社会转化，由超越企业框架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劳动才能产生（“劳动的社会化”就是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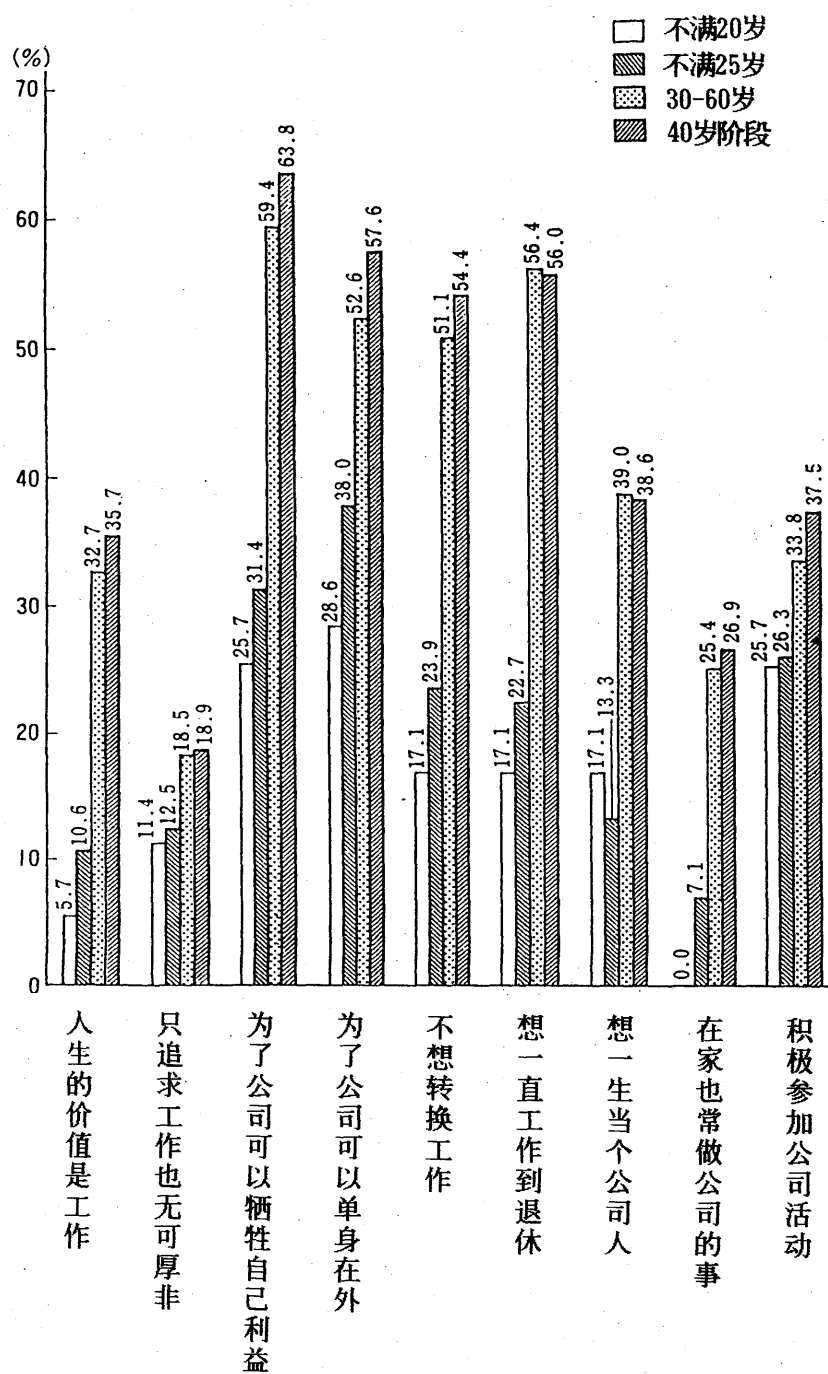
### 资本是其自身的掘墓人

以上讲到的那种变化，会被认为仅限于极小的范围。确实，我们所举的例子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状况。但是，即使前面列举到的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能作为典型，笔者也同样认为，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在生活协会里，已经开始重视征集职员们的建议与方案。另外，即使是本人直接了解的范围之内，年轻的职员们自己组织监事会，在外推销产品的年轻职员被给予着未曾有的权力，广告代理店出资让职员们去旅行，这些情况虽然不能与上述的朝日电视台的情况相比，但也同样表明着这个变化的本质。

笔者更加重视的内容在于：这个变化是资本自身的目的，即获取利润的目的所不可缺少的。不管劳动者们愿意与否，这个变化总是被向前推进。正是因为资本作为资本来运动，才有了这个过程。也正因为资本存在于激烈的企业间的竞争中，这个变化过程才得以被推进。即，这个变化过程推进着由生产力的扩大到利润的扩大这个资本的实质内容，而绝不是资本自身的反方向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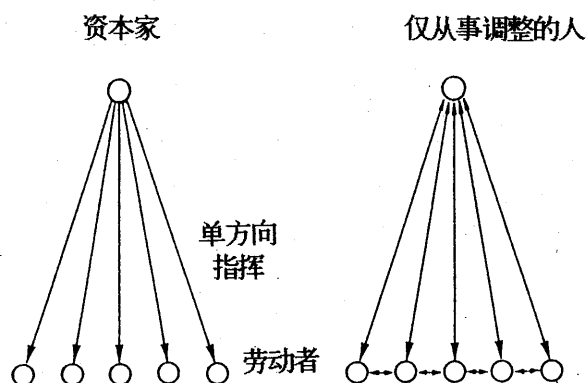
也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到的资本是其自身的掘墓人的意思就在于此。有了这样的条件，这个变化过程也就成为必然了。所以，虽然现在这个变化还很微小，但它已经是必然性的东西了。若是这样，那么，10年、20年之后，全社会性的变化必将到来。

第3图 不同年龄组人对公司的认识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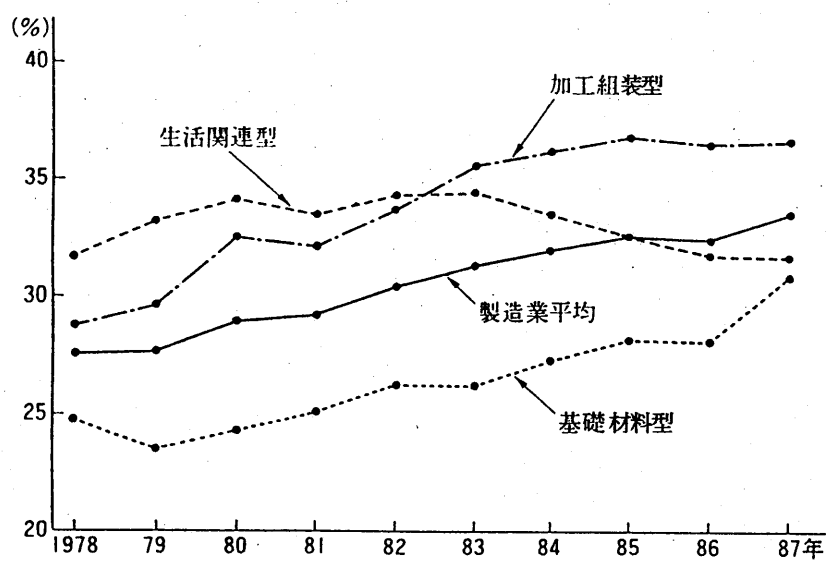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雇用问题研究会（劳动省委托）编“关于日本的雇用习惯与勤奋意识调查”（1985年）。

第4图 单方向指挥向双方向指挥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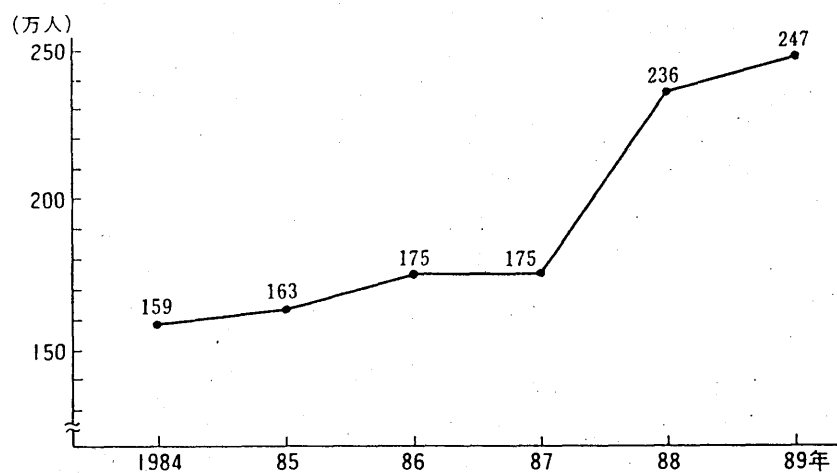


第5图 付加价值简明物资财富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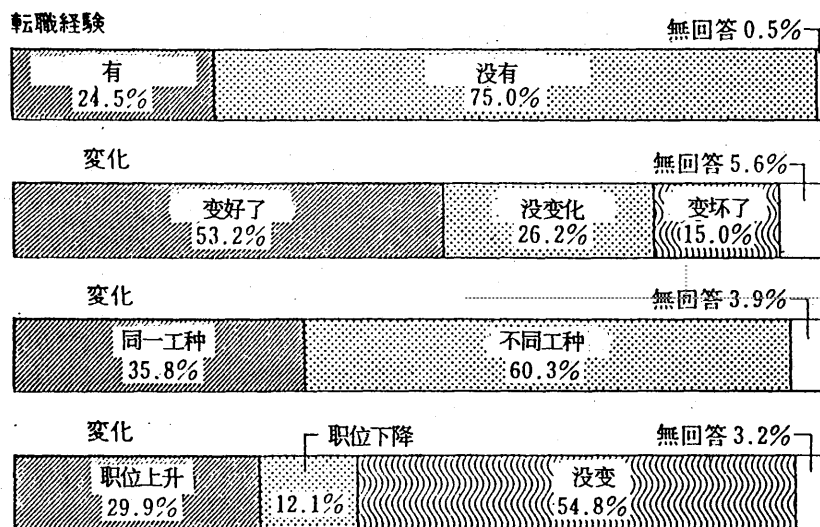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济白皮书》（1989年），  
图中数字仅为制造业之数值。

第6图 转换工作者的急增状况



资料来源：总务厅资料。

第7图 转职经验与转职效果



资料来源：1989年利库路德公司的调查。调查对象是首都范围内的民间企业及在政府机关工作的10000人。

## 6 情报革命与市场机制

### “个性的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以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软性化是在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且也同样正在形成着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生产关系。一个不同于封建主义制与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式正在时隐时现，我们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勿庸赘言，这正是因为劳资关系的根本转变所致。

象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技术与人类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封建社会以手工艺人的熟练程度为基础的生产力是以手工业劳动手段的发达为前提的，同样，在以机器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中，一定的管理能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对应着机器的高度化，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增加了。从而，当我们将封建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分别定义为手工艺人生产力、机器的生产力与个性的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析与这些生产力相对应的劳动手段与人类的发达程度。在这一点，如果分析这个新的软性化社会，即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础，那必将涉及当今的情报革命。

情报革命是软性化社会的基础，这在前章已有若干论述。即正因为计算机的普及，人类的劳动才成了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带有个性的劳动。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情报化过程也带来了大量的象仅仅是敲键盘，输入文字等简单的劳动，只是统计数字表明这种倾向正在缩小。这也可以认为是与当年的机器大工业初期首先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然后这种体力劳动逐步缩小的情况是一致的。即，作为历史的整体倾向，机器大工业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情报化也会使人类从情报处理的业务中解脱出来。

但是，情报革命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此。本章我们将讨论其各种各样的作用。

### 企业组织的软结构化

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作为企业组织的软结构化的技术基础，即情报革命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会认为，企业是一定数目的人组成的“连动体”。但是，这一定数目的人为何不在市场中交换其劳动服务，而要在特定的组织中进行非市场的结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联着交换成

本的问题。

例如，生产某种商品，将其平分为a、b、c三个工程，担任这三个工程的个人业主分别定为A、B、C，这样，A、B、C三者就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市场交易。如图8所示。A与B、B与C之间每次在其贩卖价格、交易量等方面可随时修改契约，从而市场也随时可以调整。但是实际上，展望这个交易的长期安定性的时候，比起市场状况的调查，省略每次繁杂的交易契约成本应该是更合理的。省去每次交易成本的优势越大，那么A、B、C作为一个“企业”，就更有其组织上的结合的合理性。这就是企业作为一定人数的连动体形成的实质性的合理面。

但是，以上的状况有如下两个条件：①短期调整的必要性相对少一些，即契约变更的必要性越少，市场状况越安定。②交易成本相对地增大。但是，在消费者的偏好极易转移、商品的种类与数量都在急速变化的当前的软性化社会里，条件①正在急速丧失。另外，因为情报革命的到来，情报收集、处理的成本也正在消失。所以，条件②也正在消失。这是当前的实际状况。并且，一般来讲，企业的规模也在缩小，至少，企业内部的交易不得被允许。最近的企业分散化、分权化等形式的变化倾向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技术基础。

从以上的市场或是企业组织问题转过头来看企业自身的变化的时候，情报革命在企业内的意志决定、消减成本等反面也有如下的效果。

图9表示企业内部有三种情报传达方式。我们一看便可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如果设定参与成员数为N，那么类型I需要有 $N(N-2)/2$ 个情报联结。与之相比，类型II与III只要有N-1个即可。这样，类型I的场合就需要有更多的情报流通，这个情报成本若是过大，那么类型I的运转将是极缺效率性的。所以，在情报革命之前，集权组织或是社会性的集中形式与这种意志传达成本的效率性是有关联的。

现在的情报革命正在突破着这样的制约。或者说，更加有个性的成员们的意识与创造性正在通过情报革命开始传播着。这种情报传达成本现在虽然还不是零，但至少是正在下降，所以，“传达的优势”正在被推广着。情报革命正在屏弃着集中型与集权型的组织，要求着企业成员之间情报差别的缩小。资本的专制，即由资本家来独占决定权与情报的技术性基础过程也就在于此。

### 情报化有助于中小企业

以上我们看到了情报革命对企业组织的影响。情报革命同时也对企业规模有



着重大的影响。所谓企业“规模”，实际上是我们必须关心的事。

在新型社会里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离，作为课题已被提出，至少每个劳动内容(例如某个产品如何加工)的决定应该在劳动者所能涉及的范围之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劳动者对决定权的参加(对决定权的部分保有)将令人怀疑。例如，笔者本人在从私立大学转换工作到国立大学时也曾感受到，国立大学所遵循的很多规则是远离大学的文部省来决定的。这个决定是与国立大学的成员们无关的。私立与国立大学在规则决定方面的差异是笔者亲身感受到的。将个别劳动的决定权归还给劳动者，使自己站在有利地位的则是那些小企业，小企业将各种问题以较小的单位来决定。这也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在较小的时候的优势。给小企业予发展可能性的则是情报革命。

但是，到目前为止，企业为何向大规模化发展起来了呢？这是因为大规模企业在生产活动上有优势。例如，钢铁业保有的高炉规模越大则产品的单位成本越能降低，越有竞争力。电力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架设配线网时也力求庞大，这样做可以在有新的竞争者进入时不至于提高不必要的成本。以上这样的规模优势是大型企业的出现与繁荣的技术条件，但是现在它正因为情报革命而动摇。

之所以出现以上这样情况，是因为设备投资的主要内容只适用于该行业。例如，钢铁、化学、电机、造船等产业的主要生产设备只适用于本行业。相反，作为情报产业的主要手段的大型的计算机则只要更换其软盘便可应用于其它产业。于是，保有大型计算机的企业有参加其它行业的潜在能力。相反，也常常受到同样保有大型计算机企业的威胁。总之，各个企业相互渗透的障碍正在降低，企业的市场垄断变得困难了。或者，参加同一个产业的企业数即使不增加，如果上述的危险性在增大，那么对各个产业参加的阻止价格也确实会降低，因此也能够实现该商品在市场上由众多企业来竞争的局面。现在，夕阳产业也在追求着高附加价值化，尽管产业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市场的非垄断化发展或大或小地产生了，这正在为有抱负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着机会。

进而，关于大型电子计算机，即使不花钱购买，用租借的形式也可获得，这种制度上的条件在今天已经成熟。这可以减少作为硬件的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费用，但是反过来，这也提高了计算机软件的比重。问题在于：当软件在各个产业中有其共同性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软件能力的普遍化，各个企业的相互沟通、市场的融合将推向前进。进而，这也会使各个市场的竞争激化，即使是小企业，如果有优秀的软件开发能力，也可以渗透到由大企业支配的领域中去。这样的技

术条件目前正在被创造着。

取代上述的规模经济，情报通信手段组织网络的灵活利用从现在开始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利用这种新的组织间连接的经济性，无论企业大小都可以平等竞争。或者，说得极端一些，如果使用租赁的计算机，那么一个人都是可以干一定规模的事业。让我们引用井原哲夫在《大型企业之后的体制》（讲谈社出版，1990年）一书中的一段话，井原在书中说，当企业分解加速的时候，经理一人甚至可以完成一个大企业的活动。如果在头脑中有商品的印象，可以将这个新产品的具体设计内容委托给商品开发行业、然后要厂家代为加工，然后再委托广告公司做广告，最后将贩卖委托给批发行业。其中，具体事情若是需要人手，可以让人才派遣公司来派人，也可以利用租赁形式租借事务所，工具等等……

以上这段话多少有些极端，但是被这样设想的社会正在到来，这是事实。情报革命从这个意义上威胁着大企业，但它正在给有创造性的企业提供机会。

#### 多品种小数量的生产与成本的降低

情报革命为中小企业带来的商业机会是以上简单几句话所无法表述尽的。

情报革命可以提高对消费者的兴趣、嗜好的捕捉能力。所以，它可以结束那种对同一种类的产品进行大量生产的时代。现实正在向多品种、小数量的生产型的消费社会转移，这为中小企业在某些项目上参与市场（或是维持市场占有率）提供着条件。所有的人都坐T型福特汽车，只喝可口可乐的时代，则没有中小企业渗透市场的空隙。但是，现在已不是这样。在差异化与个性化的时代里，小企业只要能表现微小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力而起作用。

或者，即使社会不进行中小企业化，这种多品种、小数量的生产也会加速大企业的内部分权化。如果在一个企业内想实行集权式管理，去进行多品种生产，那么，这个企业的核心都必然要处理庞大的情报，这将会发生恰象第1章所讲的苏维埃的集权型经济和机能不全的情况。从而，公司分散化与中小企业化即使不会推进，企业内部生产决定权的分化也将不得不被推进。

商品生产者利用情报技术可以抓住消费者的偏好，但反过来，消费者们也利用情报来收集商品。例如，当我们假设某种商品总是从一个商店购买，这时，有些消费者会想到，其它的商店也许会比这里卖得更便宜，于是他们便会为此收集情报。但是，这同时也会产生收集情报的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考虑到其它

商店也许会便宜，但是如果确认那种情况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太大，那么，继续在原来的商店购买也有其合理性。从而，对于买者来说，情报收集成本是其与卖者之间的交易能否继续保持的决定性条件。

现在的情报革命能够降低着上述的成本，所以也可以削弱上述交易的连续性。实际上，最近常听到企业间的交易应修正为交易间的企业的说法。进而，卖方企业正在面临着竞争，这也为小企业渗透市场开拓了可能性。至少情报收集的活跃性作为阻止市场垄断的因素被预想到了。

同时，在将以上的情报革命理解为降低情报成本的时候，作为整体，异地间的商品交易成本(成本+运费)也可削减，其结果是物资的移动范围被扩大了。当我们考虑今天东京与大阪之间的小豆交易的时候，假设大阪的价格比东京高，那么将大阪的小豆运到东京去卖如何？这种情况存在着如下的条件：例如，如果东京与大阪之间的小豆价格差 $<$ 交易成本，那么，两地之间的交易将没有利益。但是，当东京和大阪的小豆价格差 $>$ 交易成本，那么则有利益产生。即，当市场的范围被拓宽的时候，交易成本的减低则不可缺少，在运输成本降低的同时，情报革命所带来的情报收集，处理方面的成本减低，在这个过程中则是技术性的推动者。当前，在世界规模的市场竞争中，这样的情报革命可以作为一个归结来理解。现在的情报革命废除着各地的孤立状况，抑制着市场的垄断，并通过物的交流扩大着全社会的交流。

### 个性、自由与市场机制

以上我们粗略地看到了技术水准带来了市场上选择幅度的扩大，同时也使小企业的设立变得容易了。但是，市场决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理由，它还要求着“价值”上的东西。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个性，存在于每个人之中，不是他人应该干涉、介入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没有规定什么选择是正确的、什么选择是错误的，即使有这样好恶的理由，他人的干涉也缺乏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个性”对每个人的自由与自律有价值方面的要求，也正因为这样，有复数选择可能的自由市场被社会性的要求着。

从而，“软性化社会”与“个性”愈加增大的时代，对人的指导或是管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是被否定的。不限制有自律的自由，并且使选择成为可能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被要求着。

但是，这个被要求着的市场反过来则正在以个性为其基础，这个反过来的关系也极为重要。

这就是说，对于每个人来讲，市场首先只能带来消费场所中的自由。但是，在有无数的选择机会中，可以选择合身的西装，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饭馆，这些带有自己意识的选择若没有“市场”的自由则无法存在。换言之，如果应该穿的服装都是一色（制服！中山装），应该住的房子也都一样，那么，将不需要、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识来选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创造个性的一个社会体系（同时，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强制”）。

这是一个曲折的、必要的、辛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消费者被企业的市场折腾着，被流行趋赶着。但是，若没有这个过程，将无法发现被折腾着的自我。自我实现的个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确立。所以，市场是个性的基础，是前提条件。

另外，市场在如下的情况下还被打上了自立与自由的价值上的印迹。市场的扩大使各种各样的物资与服务被投入到金钱的交易之中，只要有钱财，不依赖于他人也可以自立。例如，如果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金钱，在修建房子时，不向亲戚借债也可以通过建筑部门办到，搬迁也如此。另外，若是想结婚，不通过亲戚介绍，用自己赚来的钱向婚姻介绍部门讲清，也可以办到。就连教育、医疗以及老后保障等问题，不依赖于家族、亲戚，凭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完成。这样，在市场上可以用金钱买到所有的东西。因此，只要不讨厌“自我努力”，即“靠自己来赚钱”，那么，市场存在着获得一切东西的可能性，并且没有依赖于他人的必要性。使每个人在经济上自立的社会体系正在这样地实现着。

进而，问题在于当每个人都自立，都能自我维持的时候，其他人对其事情的介入便失去了根据。即当自己修建房子而求别人帮助的时候，可以向别人诉说意见而不能发牢骚；求助亲戚帮助时也无法向自己的老婆说三道四。

反过来说，在自由，即拒绝来自他人的强制的过程中，生活上自立的现实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从实现这个条件的意义上讲，市场是带有决定性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的。

#### 由市场所联结的新的人际关系

市场的社会价值被提出了一些疑问，即，市场是不是在组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否使人类四分五裂？市场是否带来了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只要我们

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看作是过去那种共同体式社会的东西，那么市场的作用方向确实如上所述。

但是，象上边所举的例子中的情形，修建房子也好，搬迁也好，找媳妇也好，假如都只有依赖他人的时候，那么，这个真正的不能自律性地决定的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否是好的呢？至少，这个共同体的人际关系正在崩溃。关于它的崩溃问题，如果我们以最后的共同体，即家族来做考虑的话，那么马克思曾经有过如下毫不迷惑的、积极的论述。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古老的家族制度的崩溃，无论可以看到多么的恐怖与厌烦，大工业在其家庭事务的领域里，在被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妇女、少年、少女、孩子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创造出了高于家庭，两性关系的新的经济基础”。（《资本论》、日文版全集、第二、三卷 ■、637页）。

从而，我们在更高阶段的社会里所追求的新的的人际关系也许决不是古老的共同体式的东西。它应该是取代于“贯穿所有领域的同质的、共同的”（仲村祥一之语）人际关系，是承认个人的多样性，并将人的多样性作为个性，作为人格来尊重的人际关系。为此，对个人的尊重应该成为众人尊重众人的新的人际关系，即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的基础。

让我们再一次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曾经说，“生产力从这些人手里被模拟，从而，所有的现实性的生活内容都被剥夺，这些人变成了抽象的个人。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个人被置于能够相互联结的立场”。（《德意志意识形态》，日文版全集，第三卷，63页）

笔者对这段文字想做如下的理解。即共同体的成员因为其自身与作为生产手段的土地没有被分离，所以，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在生产活动的现实生活中，互相之间自动地联结着，但是，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人则没有自动地联结。在那里，个人被区别于土地，只能作为“个人”来被承认。个人内部中所存在的东西，作为其本身是抽象的，而非现实生活中的内容。但是，因为个人之外的东西的丧失，个人内部存在的东西则成了人与人之间进行联结的唯一根据了。

在这里，既然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没有新的联结的根据，那么，人们是否在完全相异的场所劳作则不能成为人们是否相互联结的分歧点。换言之，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是狭窄的。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很多日本兵都认为是忠效于父母与天皇的，为了摆脱这种思维的狭窄性，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

的产生是不可缺少的(以上两节的内容参照大西著《政策科学与统计的认识论》，昭和堂出版，1989年，第三章)。

### 为了使市场消失的市场

以上我们对市场所做的积极的评价，并不等于我们主张市场有永久性。与其说我们在积极地评价市场，倒不如说我们在积极地承认市场的灭亡。这个问题在本章的最后将给予若干论述。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个性化、软性化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想象的是这种市场的产物将彻底地超越市场。因为市场将所有的东西都以货币这个单一的价值尺度，即几元，几千元，几万元的数值来单一指标化了。另外，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乃至价值尺度是以劳动时间为测试标准的，在它背后尽管想定其有着“效用”与“抽象的人的劳动”，但它们同时都是假定各种物品的内在的共同性，这一点是重要的。

实际上，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机器大工业是其最初的现实基础。在机器大工业之下，封建制的生产力解体了，所有的劳动作为机器操纵的劳动而被单纯劳动化了。这时，制造钟表、冶炼钢铁、制造杯子的劳动，都已经与这些制品的具体的有用性无关，所有的劳动都变成了单纯劳动。制造钟表、冶炼钢铁、制造杯子都作为没有区别的、相同的劳动直接表现着。这种现实的基础存在于抽象的人的劳动，或者各种物品价值计算的可能性，即所有物品价格化可能性的背后。

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讨论的软性化社会，个性时代的生产力中的个别劳动正在以具体的形式体现着，也正因为这个具体化，它才表现得最有意义。例如，前一章所提到的新闻播音员的轻快的语调，设计师们在设计新产品时所动的脑筋，都带有着与他人不同的个性。播音员的价值以收视率的形式来表现，新设计出来的产品则以一定的贩卖额来量化。但是，笔者认为，不同的东西用同一个指标来衡量的不合理性，是不是应该根据这样的多样性，异质性的发展来加以注意。每个人所动的脑筋是不一样的，将其量化后来比较是不合理的。这个说法大概不会是无理的预想吧！

在我们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奴隶制时代，奴隶就象牲口一样，是以头数多少来被认识的。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每个人作为自身的存在，是不能轻率地进行量化的。对于每个人的认识，对于每个人的劳动及智力所相对应的社会感

觉的认识，应该放之于劳动的变化(软性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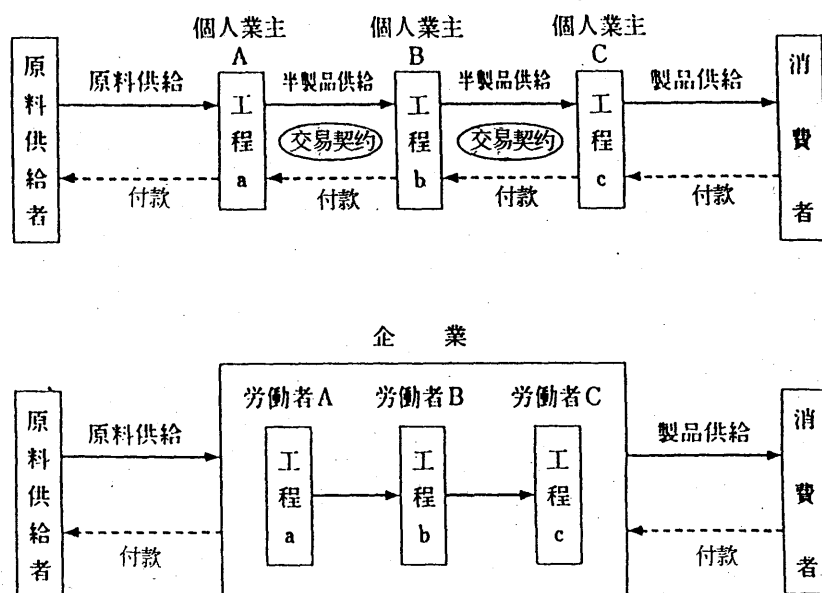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不能将以上的情况绝对化。但是，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那么，被彻底地量化了的市场将会被人们看清。这种可能性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纲要》中将人类发展史做了如下的阶段划分，①人身依附阶段；②在物质依附之上所建立的人身独立阶段；③个人全面发展之上所建立的有自由的、个性的阶段。我们在前面所论及到的“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可以表述为马克思所说的①的内容，而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市场机制可以表述为马克思所说的②的内容，我们所提出的超越市场的阶段也与马克思的③相对应。另外，马克思还曾经说过，③阶段只有通过②阶段才能实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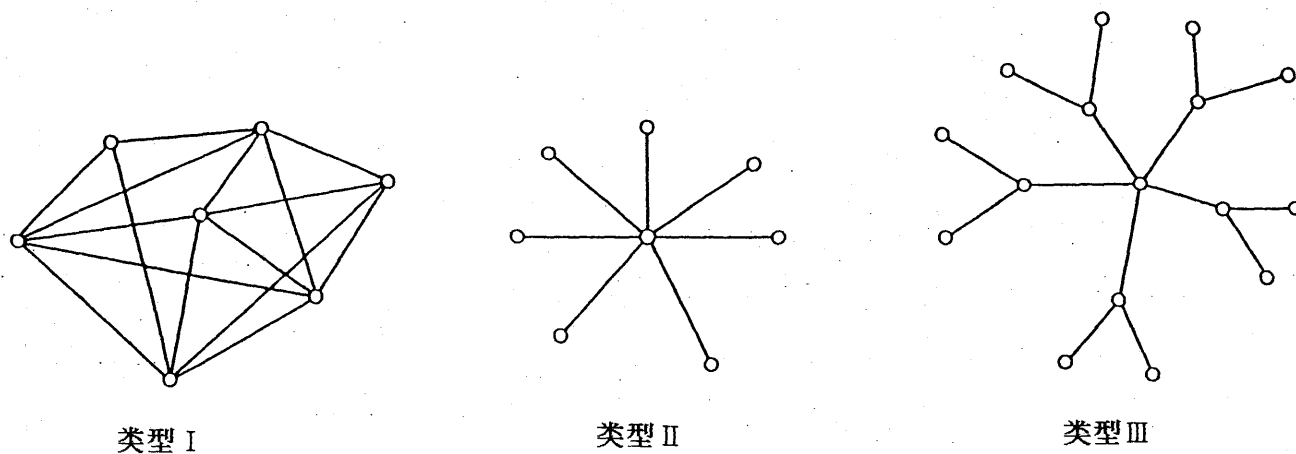
我们的“市场消亡论”，决不是“废除市场论”，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带来市场消亡的是“软性化”，“多样化”的倾向与趋势，这个基础存在于每个人的个性化之中。带来个性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市场机制。

笔者并不否认市场机制的各种各样的残酷的表现。因为，没有这个过程将无法向更高阶段迈进。这个过程不是用消灭市场的方法实现的，而是由市场自身的发展来开始的。

第8图 各工程的市场组合



第9图



注释：参见佐伯启思、《市场社会的经济学》，  
新世社出版，1991年，199页。



### 斯大林与无政府主义

在前面的两章中，我们论述到了企业组织的软结构化，即自由化，也论述到了作为专制力的资本的灭亡倾向。我们看到了这些是与市场的发展步调相一致的。但是，市场的发展并不是以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解体形式来进行的，而是以资源分配方式来进行的。从而，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国家对经济介入的缩小。从这个意义出发，展望国家的消亡则是本章的课题。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里，国家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愈加扩大化。与其对这个现象进行批判，不如将其理解为是工业化急速实现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可能会将独裁开发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的内容。造成这个误解的原因又被我们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的消亡问题。

当然，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多为官本位主义者，所以他们无视国家的消亡这一课题。批判他们利用社会主义之名搞社会主义不应该有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用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大歪曲者应该是斯大林。

斯大林与之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一个政治势力则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斯大林在《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7年）一文中，有过如下论述。

斯大林说，问题在于，尽管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同时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斗争舞台上，但是，这二者却是由完全不同的原理来构筑的。无政府主义的基石在于个人，个人的解放是大众及集体解放的最重要的条件，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考。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思考，在个人没有得到解放的时候，大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大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大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最重要的条件。即，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大众没有得到解放的时候，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大众”（《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国民文库版，53—54页）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议确实在于个人与大众的关系上吗？关于这一点，对照着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有益的。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与斯大林在如下方面有所区别。例如，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有过如下的论述。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以下方面：①前者以国家的完全废除为目标，认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废除了阶级之后，作为国家的

消亡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是可以实现的。后者则因为没有理解这个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想在今天或是明天就完全地废除国家。②前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破坏旧的国家机器，并且应该使武装的工人组织转化成为新的国家机器。后者虽然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在对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国家机器，如何利用他们的革命权力方面，只有不明确的思考。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前者要求利用现有的国家机器，使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而后者则否定这一点”（日文全集版，第25卷，524—525页）。

归纳以上三点，可以得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①国家是废除还是消亡；②是否承认过渡时期的权力。这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所讲的个人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或者，可以这样说，列宁认为，①国家在条件成熟时会自然消亡；②国家的存在仅限于过渡时期，至于是消亡还是废除，其最终结果与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反过来说使二者的一致点暧昧化的，即大众还是个人问题则是斯大林的论调。

从而，在我们描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形象的时候，必须展望没有国家的社会。无论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描绘的，其结果将是“无政府”的社会。把国家理解成是多余的东西，是寄生的肉瘤（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反过来正好导致了权力的扩大化，也正好形成了列宁死后那个集权型社会主义的致命的问题点。列宁曾经严厉地批判过将社会民主主义规定为国家主义，也批判过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认识与倾向如何呢？以上是引起我们反思的重要论点。

### 为了国家消亡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在国家消失上有其一致点，但这并不能解决二者在其他方面的对立。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没有时代限制的，全面的、对权力的否定也确实无法接受，列宁，斯大林与其所做的斗争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反过来说，若没有这样过分的批判者，那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以及对德战争中，斯大林能否完成与取胜也许将是疑问。对斯大林在理论上的错误不应该仅作为错误来批判，而应该阐明他所犯的错误的社会背景。

斯大林将“一个时期的国家”定义为“永远的国家”，这是非历史性的作法。他的理论也只能是适用于一时。这与“永远的无政府”只能适用于将来是同样的。所以，“一时的国家”自然地导致“将来的无政府”，这个法则，即客观的物质

根据必须阐明。另外，若不是这样，那么从这个“一时的国家”向“将来的无政府”的转化过程中，“废除”的外在作用将不可缺少。实际上，本书第2章中关于集权产生的条件的论述中，对这个客观的物质根据已经做了解释。

在那部分，笔者曾说，国家对经济的介入被正当化的根据在于若无国家介入，企业将无法实行对劳动者的管理。也可以反过来说，当企业获得了对劳动者的管理之后，则可以不要国家的指导了。总之，企业的成熟与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则可以不要国家。实际上，弗里德里西·李斯特时代的德国与殖产兴业时期的日本在纺织、炼铁方面都曾有过国家的支持。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等不成熟产业也曾经做出了大力支持。当企业未成熟时需要国家的介入，而国家介入之后企业变得成熟了，则又不需要国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正在使其自身消亡。

“一时的国家”不是“永远的国家”之说，其道理也就在于此。

企业对个人的强制在资本主义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个人，即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在个性的生产力发展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个人为了制约企业也要求国家的介入。例如，为了限制企业的长时间劳动而制定的劳动者保护法就是典型的一例。

如果不要这个劳动者保护法规，那就关联到了企业内工人自立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当个人对企业实施的长时间劳动无力对抗，无法解决的时候，社会便会要求国家介入来解决长时间劳动问题。反过来讲只要个人有能力对抗企业，则不需要依赖于国家，也不需要制定限制劳动时间的法规。这实际上也有工人与工会的关系，个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由工会来解决，这也是个人的软弱性以及工会存在理由的表现。反之，当个人强大了之后，也许就会不用工会了。

从而，总体上讲，国家的作用在于当企业和个人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对企业和个人进行保护、支持。国家一旦完成了上述任务，它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国家从最初开始就带有这种自己废除自己的命运。即使斯大林在梦想永远的国家，并为之创造了理论，但以上的这个法则是无法放弃的。按照斯大林的集权经济所产生的大量的大工业本身，其实只是现在的市场经济化，即国家的缩小的历史前提。

根据以上的意思，国家的缩小即使有“斯大林的功劳”，但还应该说它来自于对这个历史法则以及集权经济的历史性认识。集权制只不过是过渡时期的东西，劳动者保护法也不是永久的，工会也只是存在于一定条件下。

用类似的例子来说，贫穷部落解放运动和核兵器废除运动也不是永久的课题。国家也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自我认识。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

### 幼稚产业保护过程中国家对产业的支持

如前所述，国家的介入正是因为企业与个人的不成熟，当企业与个人成熟之后，则无需国家的介入。这个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也存在着。宇宙航空产业正在接受着国家的大力支持。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情况，重新论证一下国家的产业支持只限于幼稚产业的问题。

首先，国家对宇航产业的支持最主要的方式是国家大量购买飞机、导弹。卫星，并且多用于军事上。实际上，若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时的特种需求，世界的航空产业实在难以建立。

但是，近年来情况有些变化。在国际化急速进展之下，商业与旅游加速了航空业的发展。民用航空已呈现出获利的状况。例如，在飞机产业中，波音公司、麦道公司等致力于民用飞机的制造，其业绩已很明显。特别是波音公司接到大量订单，以致于自己的设备能力不能应付，要分给一部分由日本公司来帮助其生产。美国航空宇宙工业协会已经预测民用飞机的需求量在 1992 年将超过军用飞机的需求量。

当然，以上这种民用超过军用需求的逆转现象是与冷战结束有特殊关系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但是，冷战的结束与前苏联、东欧集权经济的破产可以说是同义语。从历史的大局来考虑，冷战的结束并非偶然的因素。即使没有冷战的结束，民用需求的相对成长也将不可避免。另外，军用需求自身也有其不稳定性的特征。这一点从第10图可以看出。

其次，与主要从事民用飞机制造的企业相对应，卫星发射企业、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的成功，也有技术方面的教训。民用卫星基本上是静止卫星，它的发射不一定非要军用导弹。用军用导弹来发射的主要是侦察卫星，并且，军用导弹需要避开雷达，因此其体积要求小型化。而商业用导弹则无须这些。

军用与民用在性质上的差异越大，军事产业在接受民用订单进行生产时就越不利。随着卫星广播，卫星通讯事业的急速发展，军事产业的这种不利状况将越来越大。

第三，越是注重这样技术的东西，就越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对航空工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的日本电子产业。例如，在日本的一种叫做次期支援战斗机（FSX）中，准备装备日本开发的惯性飞机装置和情报处理的小型计算机。美国正想通过共同技术开发来获得这样的电子技术。另外，象TDK磁带上的涂料，东芝摄影机技术在导弹诱导方面的应用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佳能公司在世界上最

先开发的软盘式照相机被应用于美国海军对潜艇侦察机上，以致于使佳能公司感到很困惑。在与飞机技术有关的电子技术方面，日本的能力正在被高度地评价着。这样的电子技术已不再是宇航技术的附加物，而是正在成为宇航技术的中心内容。例如，从成本价格上看，F<sub>16</sub>战斗机的25%，P3C潜艇机的35%，ASM1型导弹的65%是由电子器件来构成的。从而，与其将这些东西称作战斗机、导弹，倒不如将其叫作电子机器。只要这种倾向继续向前推进，那么，日本的技术优势将更加显著。日本的电子技术优势不是由军用产业来支撑的，而是由典型的民用消费品，即家电产业来支撑的。这一点极为重要。

从而，总体上说，在民用需求与电子技术化的当代，对于官方需求与军事需求的依赖正在降低。与其它的产业不同，即使是这样最尖端，同时也是最不成熟的产业也出现了不要国家支援的倾向。这一点在当今是可以确认的（以上内容参照大西宏论文“宇航产业的国际间再组合”，《立命馆经济学》，第39卷2号，1990年）。

### 软性化社会使产业自立

与以上的尖端产业不同，有些产业获得了国家与团体的大力支援，并且作为新的产业正在走向自立。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体育。

体育产业所包含的内容多样且纷杂。例如，职业体育，游泳学校，体育用品业，体育报，体育杂志等等都在其中。这种多样性与纷杂性正是由国民娱乐志向的延长来支撑着的。

对于体育的要求以往未必是从娱乐出发的。作为社会事业的一环，体育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那时，比起娱乐来，体育更是工业社会中对体力所要求的東西。即，如果现在的体育产业，其前提在于体育的娱乐化，那么，这个娱乐化的前提则应是“工业社会”的終了，也就是软性化社会的到来。从第12图可以看出，正在走向产业的体育，其娱乐性的项目正在被包含进去。

对于体育的产业化而言，脱工业，即软性化社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在软性化社会中，不必要一起劳动，一起休息。这一变化对于体育的产业化来说有决定性的意义。

体育产业的主体，即体育设施，正因为它是服务性行业，所以，不存在库存问题。既然没有库存问题，那么，平日若是没有顾客，设施将会闲置。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的使用费将不得不提高。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如果不准

备充足的设备，那么将会因为供给过少而出现混乱现象，一些顾客将被排挤出去。但是，如果人们的劳动时间是分散的，那么体育设施的利用率也会被提高，费用也可能会降低。

象体育健康俱乐部、游泳学校等体育设施那样，白天可以由家庭主妇利用，早晚可以由工薪族来利用，这样可以将顾客分散化。但是，在女性就业率增大的情况下，劳动时间的分散化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另外，游泳学校的79%，体育健康俱乐部的66%，网球俱乐部的86% 是女性成员。女性对体育的要求正在成为体育产业化的重要基础。女性对这种家庭外活动参与的本身，也正是社会体系变化的结果。这个社会体系的变化，正是由于整个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很多家庭事务可以花钱由外边来代办。这个结果，使家庭主妇们的余暇时间增多，走向了社会。特别是劳动内容的软性化加速着女性们劳动者化的过程，这一点应加以重视。

经济社会的软性化还促进着其它产业的自立，并且降低着来自国家的支持。体育的产业化也从反面说明它的历史意义是与国家的消亡相关联的。这一点正是我们有必要思考的内容(以上内容参照大西广论文“体育产业自立化的历史条件”《体育运动评论》第4号，1990年)。

### 自愿主义的条件

对于我们所说的国家将要废止，也许会被人反驳。反驳者会说，国家将是永远必要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他们会认为需要国家。确实，即使是现在的阶级国家，对残疾人及老人也实施着狭义的社会福利事业，如果没有这些福利，那些人将无法生存。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残疾人及老人实施这些社会福利绝不仅仅是国家，民间慈善团体在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只呼吁这种设施的必要性，是不是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呢？实施福利的必要性往往与国家相联结，推卸了自己个人的责任。“帮助一个人不如帮助全体”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参加慈善事业的人数过多，反过来对慈善事业也未必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由国家所实行的慈善事业其实质是国家主义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来自国家的福利正在转向民间，即自愿主义。这一点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例如，1985年，全世界范围内对非洲饥饿的援助活动中，国家的援助额

虽然超过民间援助的数倍，但对孤独老人的援助却多数来自民间。另外，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修缮工作也是由民间自愿筹资来进行的。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小政府”论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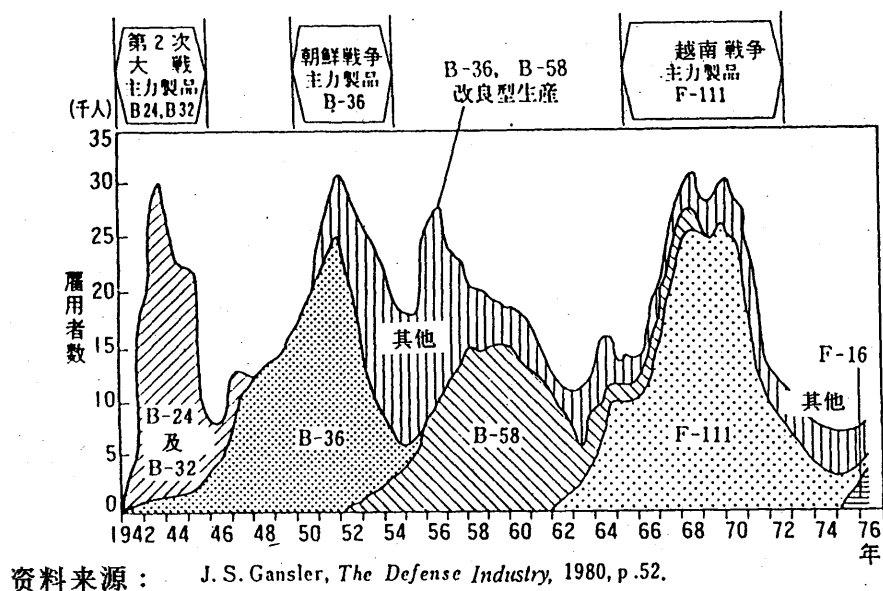
从而，当我们提出“巨大的国家”的横行问题，并展望国家消亡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学习与自愿主义相关联的新自由主义。福利事业是必要的，但不能用税金的手段来筹集其资金。若用税金来实施福利，那么不愿出资的人就成了被强制的人了。当然，自发性的捐款在现阶段也许无法实现，但是弥补捐款之不足而用税金的方法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这是问题的基本思考与出发点。这样的自发性到目前为止虽然无法期待，但是这种变化在广范围内已经能够看到了。

例如，让我们看一看新型年轻人的状况，他们在企业或是学校感到不自由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获得自由与充实的环境中，他们对于有价值，有社会意义的东西带有一种潜在的要求。这是对获取自由与充实的一种心情上的自然表现，而不是来自对自由与充实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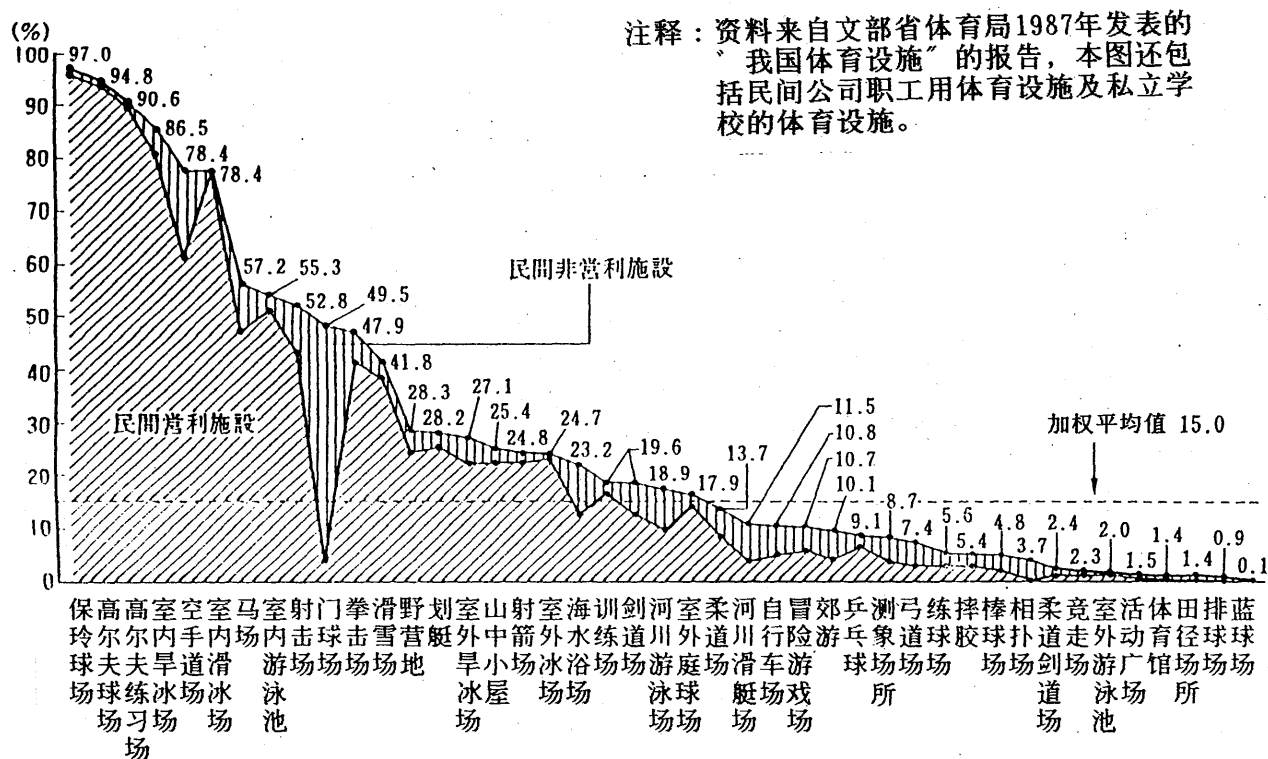
自愿主义总是产生于有一定收入的社会阶层。这样说，也许会被反驳为那是有钱人的自愿主义。所有的新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如此)几乎都是在经济富裕的阶层中产生的。反之，当全社会的所有民众都达到富裕，自愿主义实质性地变成一种社会共同意识，那时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那种状况不用说还远未到达，连我们进行预测的目标也相距甚远。

综合以上所述，企业的成熟，即自立的同时，自愿主义自发地实现，从而，国家的必要性将逐步地缩小。关于非洲，天安门等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情报，人们之间这样的心灵上的沟通能够实现的时代，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第10图 General Dynamics 公司军用飞机第4工厂的雇用增减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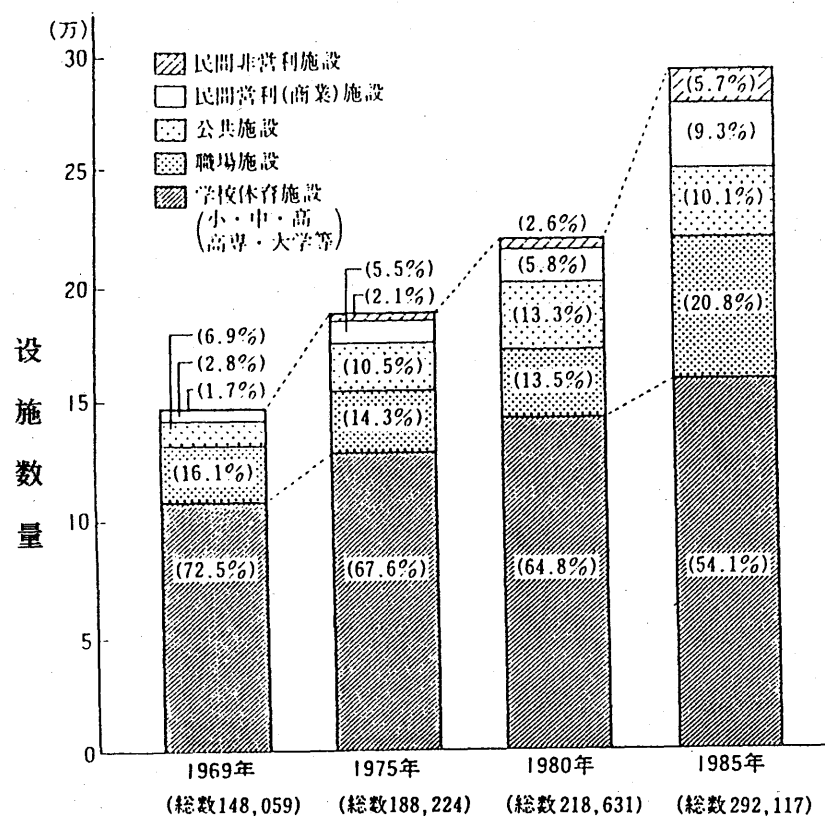


第11图 各种体育设施的民营化程度 (1985年)





第12图 各部门历年所建体育设施数量的状况



资料来源：文部省体育局1987年发表的  
“我国的体育设施”。

## 8. 社会主义是什么

### 熊彼特与马克思

在第Ⅱ部分的5、6、7章中，提出了笔者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越是讨论这个问题，越觉得它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没有接点，并且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从而，我们可以断定，以往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也是我们设定本书第Ⅱ部分的理由。

以往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个区别的中心内容必须明了化，不能暧昧。本书所提出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带有创造意识的个人是否产生了，这个产生是局部的，还是全面性的，这是问题的核心。

在本书第Ⅰ部分中，我们反复地讲过，马克思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并且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承认大工业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性。在大工业之下，一部分人（资本家阶级）对大多数人（工人阶级）的单方向指挥与监督应该重新看待。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对创造性与决断性提出要求的只限于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的劳动者只是资本家与机器的附属物。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指挥者与监督者容易操作的条件。

但是，如前所述，这样的情形不会永远继续下去。以消费场所为中心，个性将逐步出现，在消费领域，需要着有个性的商品。从而，有个性的生产也就不可缺少。这时，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进多种多样有个性的生产。只是一部分人带有创造性是不够的。从而，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一个有创造性的，成熟的，多数人的产生是必要的。这些人的产生是在局部还是在整个广范围之中，是我们所讲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

尽管这是一种侧重于机械的生产力或个性的生产力的历史观，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与广度的分歧点来说，这是一种人类发展史观（与池上氏的人类发展史观在内容上有很多区别）。作为重视人类发展的一个中心内容，即企业家能力问题的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同时应该提到的则是熊彼特。

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能力的中心问题是广为知晓的推动技术革新的能力。熊彼特并不仅仅看技术革新的担当者，即技术人员，同时也重视企业家在这方面的作用，这是熊彼特的独到之处。熊彼特所说的技术革新并非狭义的技术开发与发

明，而是对旧技术进行重新组合(combine)。从这个意义上讲，熊彼特的技术革新可以称作“新结合”(new combination)。

但是，修改他人已经完成的东西，这需要寻求放弃传统，打破所有束缚(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岩波文出版，上卷，239—240页)的能力。这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性与个性。但是问题在于熊彼特没有想定这个历史过程应由多数人的能力的获得来实现。

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历史观中，企业家的作用逐步地被日常事务所取代，所以，发挥个人创造性的余地渐渐地消失了。熊彼特将这样的组织机构的庞大化理解为社会主义。其结果在他的技术革新论中，对企业家的个性与创造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同时认为，企业家的这种素质不但没有广为传播，反而消失了。这后者与我们的历史观彻底不同。

这种历史观上的差异是有现实根据的。熊彼特生活的时代是重化学工业的时代，正是国家的经济机能扩大过程的时代。关于这一点，与凯恩斯所说的从“市场的失败”到“大政府的必要”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巨大的集权国家的崩溃与发达国家的政府缩小过程正在进行着，熊彼特体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或者，至少马克思所主张的废除资本家对精神劳动的垄断也已经不再是不可能的东西了。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发挥其创造性的社会似乎也可以展望。马克思应该将这样的社会想定为社会主义。不是描绘一部分人，而是描绘所有的民众的发展则是决定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未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与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歧点也就在于此。

### 劳动运动的作用——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

以上谈到了所有民众的发展问题的必然倾向，对于这种必然性有做出说明的必要。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前述的消费领域中的多样性与个性的不可逆过程。

消费的多样化与个性化的进展也有其前提，这包括经济上与时间上的充裕问题，即追求制品的功能与享受的感觉问题。工人的工资不提高，劳动时间不缩短，则不可能实现。劳动运动的历史作用，即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其实，每次运动的参与者仅仅从改善生活的目的出发，并不太关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体制问题。这种劳动运动超越了意识形态，带有“要求一致的民众组织”的基本特征。这种与主观相脱离的，起着历史性作用的事情本身，也正是这个过程的必然原因。

这个问题与我们在第4章中所论述的资本是其自身的掘墓人的问题有相似之处，这是我们不得不感觉到的。资本只追求眼前的利润，但是，当只有有个性的，多样化的东西才有销路时，资本也只能顺其自然，脱离其主观，起着客观的历史作用。从而，完全相反的资本运动与劳动运动，尽管其目标指向不同，其结果却完全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的社会主义，其目标决不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这从资本运动与劳动运动并非同时存在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不同的事物进行着不同的运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不同的结果，辩证法中的发展的必然性所讲的也正是这个内容。

从而，本书的读者若是企业家，就应该发挥着上述企业家的作用，若是工人，就应该发挥着将劳动运动从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作用。因为双方的直接目标不一样，所以双方的直接对立也绝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因为这种对立的方向不同，才是引导出新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劳动运动中劳资关系的协调路线的关键问题也在这里）。

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工资升降方面，企业家与工人的直接目标对立着，所以，这时两者不可两立。但是，企业家若是无意给工人长工资，则无法实现“机械的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工人若是坚持不断地要求长工资，那么也无法为“个性生产力”的到来做出准备。从而，两者在推进历史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即前者的目标若是在于追寻某一个生产关系内的成熟的话，那么后者的目标则在于为下一个生产关系的到来做准备。进而，未来的社会并不是资本为主人公的社会(Capitalist Society)，而是劳动者为主人公的社会，资本与劳动存在于非对称的位置中。虽然两者都在创造着一个新的社会，但是，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也是事实。

### 劳动市场的意义

在新社会，即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中，由劳动运动所带来的工资与时间的保障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课题并不是仅仅依赖劳动运动来推进。用劳动运动的形式使劳动者结成集团，并用集团的力量来实现要求，这是一种方法，但方法不仅仅限于此。其实，让每个人握有对抗企业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最近，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资在上升，劳动时间也在缩短。这与其说是劳动运动的作用不如说是劳动市场压力的结果。

例如，根据劳动部《每月劳动统计调查》的数据，30人规模的企事业单位的年间总劳动时间从1988年的2111小时减少到了1990年的2052小时，即劳动时间正在急速下降(参照13图，92年已降至2016小时)。按常规来说，经济景气时劳动时间应该上升，但这次反而缩短，所以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不能忽视人手不足的压力。人手不足并非暂时的，劳动部曾预测，这样的劳动力比率(生产年龄人口中就业者的比率)如果持续下去，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的劳动力不足将分别达到53万人、259万人、559万人和910万人。所以这样的人手不足将越来越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点应该重视，即，若是劳动条件不改善，工人随时有可能调换工作。这是工人对资本的对应变化。这是在第5章着重强调的工人们摆脱公司的问题。第14图可以明了劳动时间与退职率的相关关系。在人手不足的过去与现在，企业不得不缩短其劳动时间。第13图同时还显示着日本生产性公司总部的新职员的情况，新职员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倾向。当问及他们工作与生活哪个是中心时，回答工作是中心的比率在不景气时期则下降，在景气时则有上升的趋势。第13图中，两条曲线在最后两年的下跌是明显的，这也反映着近年来的离职状况。所以，对于劳动时间与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言，社会意识的变化意义重大。

最近，为了雇佣年轻的职工，公司出钱购买高级汽车，并将其借贷给新职工，对于有办法招进新职工的人免费送其到美国西海岸去旅游。这些例子都存在着。我们必须了解到，并非用劳动运动的形式，而是用劳动力供需的变化所带来的工人人们的意识上的变化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这样的劳动意识的变化实际上可以说是美妙的“斗争”。当上司命令你加班的时候，你可以坚决地拒绝，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对于强制地推行长时间劳动的企业可以提出辞职，这在以往也是很难实现的。

关于这一点，笔者本人有过亲自体验。有个学生毕业后还一直与本人有来往，工作了几年后，想再考研究生，但公司怎么也不同意，人事部长对他递交上去的辞呈无论如何不想接受。最后辞呈共提交了5次，并且还采取了无故欠勤的手段，这样才算将工作辞掉。

某个杂志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32岁的女性，当她向公司提出辞呈时，公司对她象对待宗教信徒一样，不想让她辞职。

另外，还有一位女性在手记中这样写到：“某月某日，今天婉转地向科长提了辞职一事。并向科长解释说，在这个公司里我觉得没有我想做的事情。这么一

说，科长万般无奈，无法继续留我在此干下去。大学毕业三年后我就辞退了这份工作，因此，科长作为管理者也许会受到上边的责问……”（《日经 Woman》1990年6月）。

我们认为，对这样的调换工作与拒绝加班应给予高度评价。日本的企业社会将公司共同体意识作为其专制统制的杠杆，尽管如此，屏弃这个共同体意识的新型年轻人正在用其它的形式进行着斗争。政府总务部1990年对青少年的调查表明，在对学校生活、工作单位这二者的态度中，对工作单位表现不满的比率正在上升。这也是基于新的意识上的斗争。

### 对新型年轻人现象的马克思式的理解

在本书第Ⅱ部分，我们展望了新的社会主义，并且着重地提及到了企业社会中新型年轻人所带来的变化。这样的新型年轻人的斗争在以前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对此也只给予了消极的评价。从而，对于这种与资本进行新的形式对抗，本书的评价是否妥当，想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斗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获得一个生活舒适的社会才是我们的目的。以社会主义为志向的人往往会将斗争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心情笔者可以理解。因为资本只追求利润，对劳动者是不择手段的。劳动者在资本之下是不可能自由的，所以，劳动者必须与资本做斗争。新型年轻人的斗争即使表面并不那么激烈，但是，它却是直接对应着劳动条件的改善。新型年轻人的做法不管叫做斗争还是非斗争，关键要看其所得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不可忘记。

第二点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重视斗争所带有的意义，而不应该仅看其勇敢性。象第5章中所讲的那样，新型年轻人的斗争表面上虽然不那么勇猛，但在实质上它迫使劳资关系进行着变革。这个意义更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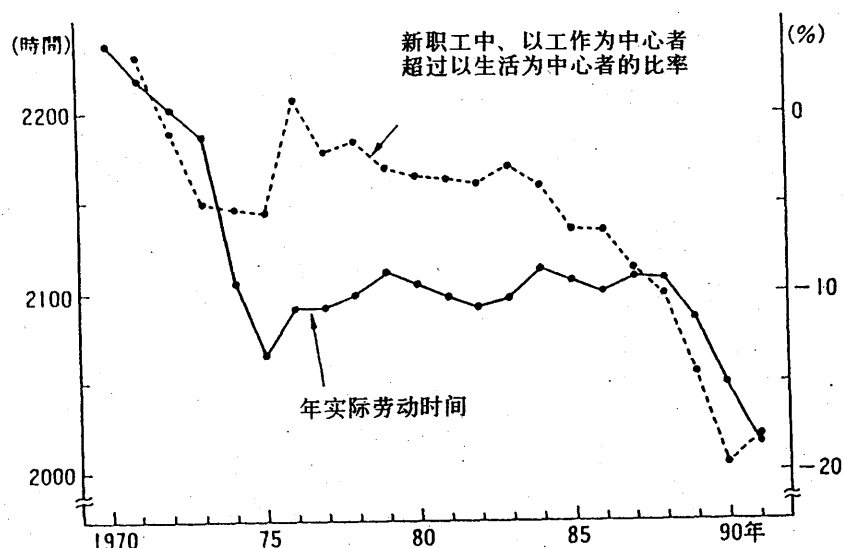
第三，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虽然明确地表明着废除劳资关系的斗争方向，但是对于这个斗争的形式却带有温和的姿态。例如，列宁在1906年发表的论文中曾有如下论述。列宁说，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从大众实践中学来的，并不是将自己在书房里创造出来的东西教给大众。另外，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承认所有的斗争方式，这些斗争方式并不是根据计划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讲到，共产主义理论中各种命题……只能是表现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表现着在我

们眼前所发生的历史运动与现实的各种关系。

最后，新型年轻人对企业社会的不满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的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条件是相符合的，这一点我们想加以强调。列宁在《共产主义内的左倾幼稚病》中所讲的两个条件是：①被压榨的大众要求改变今不如昔的生活，②榨取者无法再象以往那样进行支配。这与现在社会中的新型年轻人与企业的关系确实有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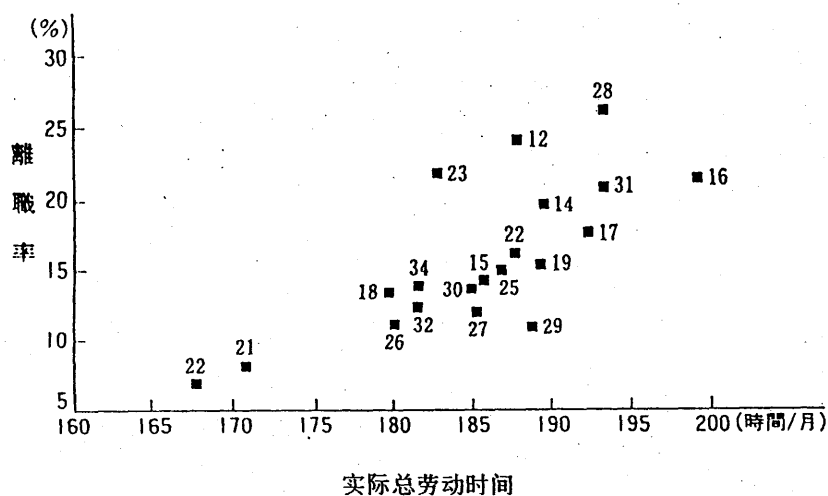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象本书中反复讲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既然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应该屏弃旧的观念，使用新的方法。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成为可能的时代。

第13图 劳动时间与社会意识的变化



资料来源：年劳动时间来自劳动部《每月工作统计调查》、数字为30人以上企事业单位的数字。对新职工的调查来自日本生产本部编制的“劳动意识调查”。

第14图 制造业部门中的年轻人离职率与工作时间



注释：1. 劳动时间来自劳动部编的《雇用动向调查》中的合计数字，离职率来自劳动部编的《每月工作统计调查》中20岁男子的数字，时间为1989年。  
2. 图中番号 12=粮食、饮料、饲料、烟草业，14=纤维业、15=衣服及其他纤维业，16=木材、木制品业，17=家具装备品业，18=纸张及其他加工业，19=出版、印刷业，20=化学工业，21=石油、煤炭业，22=塑料制品业，23=橡胶业，25=陶及土石业，26=钢铁业，27=非铁金属业，28=金属制品业，29=一般机械业，30=电机业，31=运输机械业，32=精密机械业，34=武器及其他制造业

资料来源：劳动部1991年版《劳动白皮书》第190页



## 补论1 社会主义的滞胀

象本书第I部所看到的那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初期尽管以推进资本主义化为其课题，但同时也是受国家资本支配的初期阶段的资本主义。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带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在补论1中，我们提出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与滞胀这两个问题，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潜在通货膨胀和供应不足来做对比研究。

所谓潜在通货膨胀是指在市场供需关系中，尽管需求过大，但在固定价格下，通货膨胀并不表面化的状况。对于市场的需求来说，这样的供应不足本来就是通货膨胀。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这里的课题。另外，我们同时还将考察一下在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分析中使用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作为对凯恩斯主义国家介入的批判武器，有其较大的存在价值，进而，自然失业率假说对于斯大林式的集权经济是否也是一种批判武器呢？这是笔者甚感兴趣的问题。

### 社会主义式的费利浦斯曲线与克鲁那依

关于以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的费利浦斯曲线在社会主义中的表现已有讨论。在社会主义中，供应不足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在第15图中，如果价格以 $P^*$ 为水准，那么供给与需求相等，所以不会发生供应不足。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很多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有些是被控制在很低水平上的。这样，若以图中 $P$ 的价格为水准，那么相对于供给量 $X_s$ ，需求量则为 $X_d$ ，从而产生 $X_d - X_s$ 的供应不足。即，价格下降会产生供应不足，从而又会引起物价与雇佣的连动关系。但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并从事这个问题研究的克鲁那依则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参见盛田常夫等编译的《反均衡与不足的经济学》，日本评论出版社，1983年）。克鲁那依认为需求曲线 $D$ 或是供给曲线 $S$ 与价格之间没有函数关系。从而，第15图中的各种关系可以象第16图那样存在。

克鲁那依将这个理由归结为企业的软性预算控制。并认为，在社会主义之下，企业受国家保护，不需要自己的资金，这样的企业在购买物资时，并不反映物资价格的变动。另外，在决定生产量的时候也与生产价格的变动无关。总之，国有企业价格方面的非弹性特征带来了与价格水准无关系的供应不足，也正因为如此，在价格与供应不足之间不存在着物价与雇佣的连动关系。

### 菲利普斯曲线与“自然供应不足率假说”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各国里，实际上是存在着潜在通货膨胀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商品的供应不足带来了通货膨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象第17图所看到的那样，前苏联与中国的数据显示出供应不足与通货膨胀之间有较高的相互关系。另外，在这样的通货膨胀中，因为统计上的限制，实际上有些潜在的东西还未包括进去。在现实中，是用商品的低质量来维持低价格，这反过来等于是在使价格相对地上涨，低价格的商品又使生产缩小。所以，被供应不足所掩盖的通货膨胀实际上还要超过图中的数据，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供应不足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所以，供应不足本身就可以当做通货膨胀的指标。

菲利普斯曲线是以纵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轴表示失业率。在社会主义的情形中，我们可以用供应不足来表示纵轴，库存表示横轴。从而，在供应不足与库存之间有着紧密的负数关系。这并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明。克鲁那依将这种供应不足与库存同时存在的关系成为“等摩擦曲线”，即象第18图所显示的那样。笔者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中实质上的菲利普斯曲线。笔者愿将此作为分析对象。

克鲁那依本人也认为，由于较少的库存与深深的供应不足，社会主义通常的状态是存在于第18图中B的领域。从而，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在于消减库存，而是在于解决供应的不足。这与菲利普斯曲线中将消减失业放在重点正好形成对比。

反过来，仿照菲利普斯曲线，将主要的政策目标放在横轴上，那么可得出第19图。现在，经济状况在A点上，若想减少供应不足，必然要提高库存水准。这样一来，经济状况可移向B点。这与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为降低失业率而提高通货膨胀率也可形成对照。这样，二者只能取其一，A、B两点并不存在谁优谁劣（换言之，从A向B的移动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

如果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库存水准将要增大，物资不足也将随之扩大，经济整体将会恶化。这也正是前苏联东欧经济过程中充分存在的状态。

其实，这个长期过程可以如下地理论化。即，若用政策的手段提高库存，经济状态从A向B移动，供应不足的程度可以降低。但是，在高水准库存的情况下，各个企业在流通；领域中若是不去努力，那么较高的库存率也未必能够解除供应不足。

在第20图中，“等摩擦曲线” $f$ 向 $f'$ 移动，这时供应不足将再次返回原来的水准，因此，贯穿点A和C的直线被称作垂直的“长期摩擦曲线”。这个供应不足

的水准可以命名为“自然供应不足率”。进一步，当 $f$ 向 $f'$ 移动，也就是变化更大的时候，这时，“长期等摩擦曲线”就是穿过A与D的那条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被称作滞涨，这个从A到D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滞涨过程。

### 两种类型的“政府的失败”

$f$ 曲线的移动为什么会发生呢？对于发生的机制有阐明的必要。若不涉及这个机制的问题，那么前面图中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就简单多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再一次引用一下克鲁那依的说明。克鲁那依首先着眼于消费者与企业的预算的差异。即消费者购买消费物资的计划受制于收入，而社会主义企业筹集生产物资时则未必受制于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生产物资的需求一般来说不仅变得供应不足，而且在住房，出租车等各种物资购买方面，企业都比家庭处于有利地位。其结果是这样的物资依然供应不足。当然，在“软性的”预算限制之下，各种商品的需求在价格方面不具有弹性，所以，对应于各种商品的生产性的资源分配便无法实行，从而，只带有软性预算限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性便无法受到刺激。这样的状况增大了经济整体的停滞，这是克鲁那依所主张的。

如果这样说，社会主义的滞涨过程的真正原因在于软性的预算限制体系。既然这与资本主义的硬性预算限制体系正好成为对比的话，那么，这个原因也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这与资本主义的滞涨机制便没有丝毫共通性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滞涨与资本主义的滞涨便不应该做类似的讨论。

但是，笔者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滞涨的原因也在于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例如，美国经济滞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竞争力的低落，而带来产业竞争力低落的原因则又是国家对汽车、钢铁等行业的保护政策，保护政策减低了企业的努力。另外，在飞机、电子等行业中，又过多地依赖于军事与政府订货。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弗里德曼也正是这样论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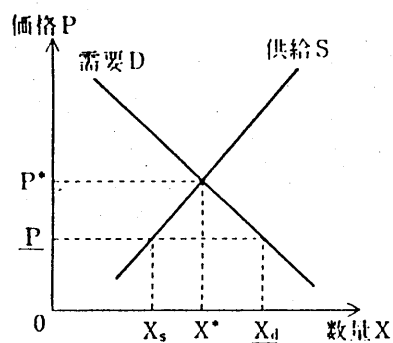
从而，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弗里德曼所说的政府介入所带来的垄断，或者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国家垄断）正是产生这种滞涨的原因。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的温情主义，即介入市场的失败，则是超越两体制，带来生产性停滞的真正原因。

我们已经论述过，以机器大工业为生产力的特征的经济，不得不强化作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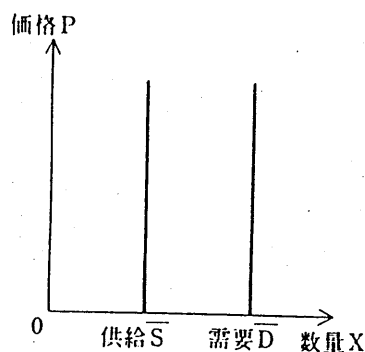
产方式基础的劳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就将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停滞的机制还在于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松散化方面。若用第2章的第2图来说明，在现存的社会主义中，国家主义对企业与个人的压制和国家对企业与个人的温情与保护其实只是表里的关系。企业与个人关系的松弛在生产领域引起了生产的停滞。这个过程与美国等先进国家中的生产停滞（包括日本原国有铁路等国有企业的生产停滞）基本上是同质的。

注目于菲利普斯曲线移动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本身，是以考察企业供给的必要性为前提的，那之后，重视供给的经济学流派进一步推进了这个研究。既然社会主义的供应不足是供给问题，那么这个分析的架构对于两体制的分析就应该都带有效性，这也不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单是现代经济学对研究社会主义的应用，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以上的意义上带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对这个问题应该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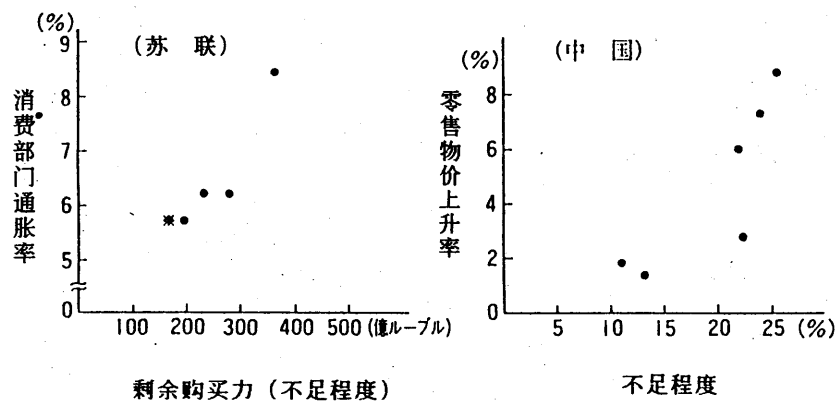
第15图



第16图



第17图 供应不足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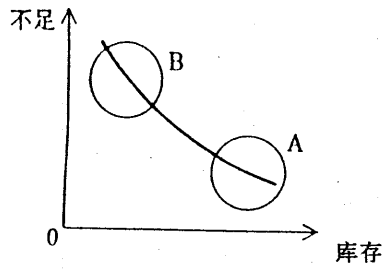


注释：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来自高斯普兰附属经济研究所的A. 希马洛夫及N. 科里金科。  
※记号的数字根据是1981-85年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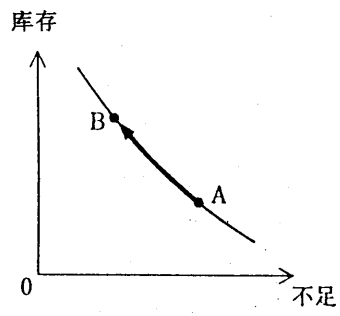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出羽弘论文“苏联的通货膨胀”《经济》杂志、1989年9月期。

注释：零售物价上升率从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中算出。供应不足度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通货膨胀研究课题组编写的论文“我国通货膨胀的综合治理问题”中算出。该论文刊登于1989年3月期《经济研究》。  
资料来源：中兼和津次论文“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会》1989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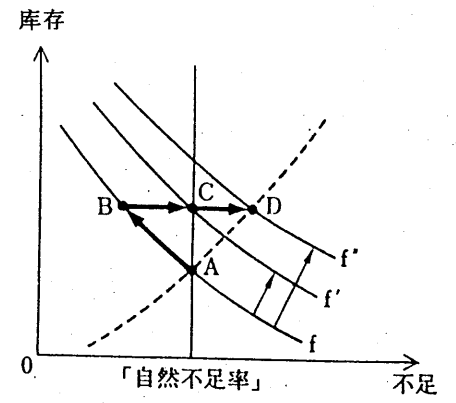
第18图



第19图



第20图



## 补论2 彼拉维拉曼的劳动过程论与社会主义

现在，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会，关注着苏联与东欧的崩溃，正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着重新的评价。

但是，重新评价以往某种理论，并对其进行根本反思的同时，应该探讨以往的理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到底偏离了多少，这种偏离是否有理论上的弱点与原因。笔者对最近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或者非列宁化）的理论倾向甚感忧虑。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化，应该是重新探求马列学说的中心内容。实际上，本书中所展开的讨论，正是返回马列的重要观点，并以此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崩溃与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各种现象。这些正是本书所主张的。

在补论的这部分重点讨论彼拉维拉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彼拉维拉曼是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介绍这本书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探讨有不可缺少的理论意义，同时，对它的不当之处也有挑战的必要。

### 彼拉维拉曼的理论贡献

彼拉维拉曼(H.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正被广泛地评价着。各种评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在理论上的积极贡献。第一，在垄断阶段的技术革新之下，劳动的强化与无内容化正在进行，彼拉维拉曼将这种能看到的事态称作“劳动的衰退”，并认为它的原因在于将劳动过程的直接统治权交给了资本，也就是泰勒主义的科学式管理。为什么“科学式的管理”握有了彻底的管理权呢？为什么劳动在它之下变成了无内容的东西呢？彼拉维拉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劳动过程中，“构想”与“实行”被分离，“构想”，即精神劳动被管理者垄断，劳动者仅仅是付出体力劳动而已。彼拉维拉曼对“劳动的衰退”问题不仅仅是从数据上来说明，而是将其作为原理来提出，这正是他的影响力所在。另外，彼拉维拉曼从以上的原理出发，展开了作为构想与实行相统一的劳动的本质，并且提出了与之相关的阶段、阶层理论。

但是，在众多的评论者所讲的以上问题之外，笔者认为彼拉维拉曼的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他在该书序论中所强调的三点，即一个是把马克思理论从宏观上与国际性的各种现象中引导回来，另一个是重视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关联性。

彼拉维拉曼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停留在把焦点对准资本主义深奥的本性及劳动者的位置上，与其这样，不如将焦点对准资本主义危机的多样的影响和危机的各种局面上。特别是，对于生产方式的批判让位给了对于作为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劳动与垄断资本》，富泽贤治译，岩波书店出版，11页）。

彼拉维拉曼还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锐利的武器，但是，这个武器的力量正在降低……因为无法改变这种后退，所以，马克思主义本来最强劲的部分已经脆弱到了极点”。

彼拉维拉曼对马克思主义忘记了将焦点对准劳动过程的批判，也关联着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劳动过程改善问题。这也是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问题的线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是改革劳动过程（即劳资关系），而是将生产手段国有化、集体化。这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7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这是我们感到惊讶的地方。

对劳动过程的重视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过程中科技与劳资关系的紧密性观察。《劳动与垄断资本》的第2、第4、第5部分中，详细地展开了科技革命与劳动编制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第3部第13章中，提及了劳动过程与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分析角度正在被美国的激进派和《劳动与垄断资本》的日文版译者富泽贤治继续地展开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拉维拉曼对这个问题是多么有先见性。

### 对彼拉维拉曼的批判点

以上可以看出，《劳动与垄断资本》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对其不足之处的指正与批判也不少。关于这些，日文译者富泽贤治在译著的跋中曾有过整理归纳。各种批判观点几乎一致地阐述了这样一点，即变革的内在动因（担任变革的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性）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彼拉维拉曼的差异并没有弄清。当然，反过来说，彼拉维拉曼仅仅停留在了一定程度上。在更高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彼拉维拉曼的差异并没有弄清。当然，反过来说，彼拉维拉曼的批判者们是否已经解释了变革的内在的动因，这一点恐怕还没有完成。

彼拉维拉曼认为，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劳动的衰退与劳动者的无能化，所以，只要沿袭这种理论框架，就不能认为科技，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变革的内在动因。当然，彼拉维拉曼也对批判者们所提出的“变革的内在动因的未解释”作了回答。他说，“我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级的潜在的力量全面信赖”他对于劳动者的信



赖可以在其它书稿中看到 (H. Braverman, "Two Comments," Technology,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 London, 1976)。但是,理论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对信赖的表明,而是在于解释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机制。所以,对彼拉维拉曼的不足之处不得不进行批判。进而,在维持劳动衰退说的框架之下,表明这种信赖的立场本身,就正在引伸出更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彼拉维拉曼在该书的序言中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决定论。他批判了认为特定的生产方式来自特定技术的理论。例如,他在该书第3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权威”的论文,并以此作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恩格斯曾说,“人类用科学与发明的才能使自然服从于自己,自然力与任何社会组织无关,人类在使用自然力的时候,人类变成了真正专制的附属物。想废除大工业中的权威的愿望,意味着想废除工业自身的愿望和为了返回纺车时代而废除蒸汽机纺织工厂的愿望(日文版全集,第18卷,303页)”。

彼拉维拉曼认为,恩格斯的这个立场犯了一个使用超越历史的权威概念的错误,即,大工业如果不可避免地要求权威,即专制,那么,在大工业之下,与专制相对立的“构想与实行的统一”,即真正的人类劳动将无法实现。在大工业之下,则只能存在着“构想与实行相分离”的劳动衰退,被彼拉维拉曼全面相信的劳动者阶级的潜在力量也将彻底消失。

换言之,彼拉维拉曼的中心主张是资本主义专制之下的大工业招致了劳动的衰退与劳动者的无能力化。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彼拉维拉曼全面相信劳动者阶级的潜在能力,那么,他就必须表明在大工业之下带来劳动衰退的其它可能性。为此,彼拉维拉曼认为,劳动衰退不是大工业的一般性的原因,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专制。若是换一种社会组织,也可能不会出现劳动衰退的现象。从而,他设想了一种不要专制,不要权威的社会组织的形态。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论述是相对立的。

彼拉维拉曼想把恩格斯的语言解释为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无意流露出来的东西。他在该书的序言中也评价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并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放在了同一个立场上。彼拉维拉曼曾引用了马克思如下的论述。

“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生产力紧密相关。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使人类改革了他们的生产方式。进而,这样的生产方式以及他们获取生活物质方式的改变又使他们改变着所有的社会关系。手工操作给各位带来了封建领主支配的社会,蒸汽机

操作给各位带来了产业资本家支配的社会”（《哲学的贫困》，日文版全集，第4卷，133—144页）。

是否是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另当别论，展示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相对而言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限定关系已经没有再做说明的必要了。但是，彼拉维拉曼提出了以下两点，即①以革命和转型的各种时期为例，这时有相反的两种社会关系可以成立。②在一个社会体制之中，可以存在着蒸汽力、电力、原子力等不同的生产阶段。关于以上的论点有必要进行评价。确实，蒸汽船曾经与绝对王政和封建领主共存。但是，蒸汽船作为生产力的有效利用则驱逐着其它落后的生产力。即使是过渡时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其中一方也只能是作为相对落后的东西而存在。既然两种生产方式不能同等地存在，那么，特定的生产力只能对应着特定的生产方式，这个本质的特性无法否认。

另外，在论点②中，彼拉维拉曼谈到了在资本主义之下存在着蒸汽力、电力与原子力等不同阶段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三个生产力阶段再细分一下。比如分别称之为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样可以使与之相对应的三个新的生产方式成立。当然，我们还应该找出这三者的共同性。但是，不管能发现多少个这样的小阶段，也不能成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对应的关系的批判。总之，只要是遵循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应该至少是沿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这种“技术决定论”来探讨问题。

作为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在彼拉维拉曼想排斥的“正统”理论中，包含着形式主义与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将要容忍的理论。

如前所述，彼拉维拉曼批判了现存的社会主义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主义中，缺少对劳动过程的变革。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考虑到非人类的劳动与社会主义是相矛盾的问题。《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各章所讲的劳动的无内容问题已经阐明，对于我们来说，将那样的劳动方式想象成为劳动者解放的社会主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已经不能再返回这个意义上的“正统派”了。我们能够采取的理论上的战略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关联着超越蒸汽力、电力和原子力的更新阶段的生产力。大工业属于哪一个社会组织这无关重要，即不必去问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正因为要求权威，所以它表现着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如果超越这个大工业的生产力，达到更高阶段的生产力，那么我们将可以展望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我们在本书第二部所讲的软性化社会

也正是这种展望。

下一节中，我们与大工业相比较，再来描绘一下这个新的生产力。

### 马克思学说中的生产力与劳动过程

为了思考大工业的生产力的特征，彼拉维拉曼引用了马克思的如下论述。马克思说，“不管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都不是劳动者支配工具，而是工具支配劳动者，这是其共同性。但是，这个颠倒关系是因为机械开始接受了技术的明了的现实性。因为自动化的转换，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手段作为资本对劳动者进行支配、榨取。生产过程中精神上的各种力量从手的劳动中分离出来，进而这些力量转化为相对于劳动的资本的权力，象以前所显示的那样，在机械的基础之上构筑起来的大工业被完成了。无内容化了的工厂劳动者的技能等等都在机械体系中被具体化了，在形成雇主权力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与集体劳动面前，这些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资本论》，日文版全集，第23卷A，552—553页）。

在这样的大工业之下，会发生如下的事情。在大工业时代，急速扩大的生产力的源泉全部在于科学、巨大的自然力与集体劳动。与此相比，无内容化了的工人的技能确实变得微不足道。即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性能的制品，这些都不依赖于工人的技能，而是依赖于资本设备和企业组织的革新程度。工人的熟练程度已不再重要，劳动变成了单纯化。所以，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的劳动随时都有被替换的可能。即工人若是对工厂表现不满，雇主随时可以将他换掉，在雇主与工人之间，资本的所有者，即雇主一直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时，被压低了工资又成了资本扩大其生产的源泉。当然，对劳动者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直接地强化劳动，直接地施行权威，也都是促进资本增殖的手段。

这样的大工业及其所有要求的生产方式对劳动者是极不仁慈的。但是，问题在于，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源泉，资本所表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这个时代最适合的生产方式。

这时，在大工业这种新的技术体系下，为了使生产力更加有效地发展，需要废除熟练的手工劳动，需要降低工资以确保利润，需要实行权威。正因为这样的背景，担负这个历史使命的资本家阶级出现了。正因为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大工业的生产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对应的。反过来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种生产力阶段来说，这样的生产关系有其合理性。

象本书第8章所看到的那样，笔者在其它的理论水准上，不否定劳动条件的改善对生产力所做出的贡献。例如，工资上升可以促进劳动向机械的转换，进而更加促进机械化。另外，对于新的生产力而言，积蓄劳动者的创造力也仍然在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宽裕程度。但是，既然承认上述历史的合理性问题，那么，对于大工业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的理解就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大工业时代之下，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则无关紧要，权威也将无法废除。从这个意义上讲，想在俄国引进泰勒主义的列宁以及正统派的劳动者管理理论则都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在于，因为生产力的基础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权威管理体系很难回避。反过来说，不是这样的生产力基础在今后是否会出现，这是关键问题。另外，在企业社会与生产体制的变化中，设备是决定生产扩大的关键，在大工业之下的这种因果关系以外，我们还能否发现其它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笔者在本书中已做了肯定的回答。

在现代的社会的软性化，即高附加价值之下，商品中附加价值所占的比率正在提高。在这个软性化生产中，机械设备作为主要的生产力源泉正在降低其机能。因为，从本质上讲，机械体系所发挥的机能是更快、更强、更多、更精密地进行生产。但是，制造具有软化性质、艺术性、更适合于人的感觉的产品，只有人类的个性与艺术感才能办到。近年来，消费者正在转向对这类产品的追求。

今天，我们在购物时，已经不仅仅只追求防寒、耐用的制品了，而是在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选择。某种汽车的贩卖量已经不再由那种车型的性能所决定，而是被其设计式样所左右。对于这种变化，企业正在全力加以适应。

### 软性化社会与劳动的未来

企业对这种新的“生产”不得不采取对应的措施，这不仅仅限于“样式”设计等部门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造就带有这种感觉的劳动者。政府教育部门已将个性教育列入了一个目标。很多企业已经为创造劳动者的个性而努力着。例如，住友信托银行的活私奉公口号，花王公司的超脱管理方案都是对这种社会要求所做出的反应。

彼拉维拉曼所说的泰勒主义在管理方面的非生产性，即“构想”者们应变能力的衰退，也可以从以上的情形中理解到。管理原本是与量化可能的东西相对应的，而与带有质的特征的东西是难以适合的。

当然，在资本的专制指挥下，引起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对应这种新局面的。或者说，如果它能对应，那么它也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这与资本的历史使命有关。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即大工业，不仅仅要求作为机器附属物的单纯的劳动，还要求尽可能低的工资。对这个要求做出响应的则是在工厂内实行专制统治的资本。在将来，一方面要保证劳动者在肉体上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他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的个性与创造性能充分发挥。即一方面要求管理，另一方面又要超越管理。进而，工厂内的专制，指挥担当者的资本将必然要消失。

当然，适应这种软性化，走向超越管理的企业组织的变化仅仅是开始而已。即使这是一个开端，但它的方向是明确的。笔者孤陋寡闻，但也常常听说有些企业在评价工人时，比起勤奋劳动的工人来他们更重视善动脑筋的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历史唯物论上的问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展望都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出发。

到此，彼拉维拉曼的困惑应该说已经被解决。即在维持大工业下权威与专制的不可避免的这个命题的同时，对将来社会中“构想与实行统一的劳动”可以做出展望。不仅如此，与其这样说，不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个命题可以展望劳动的未来。

无论如何，重视劳动过程中的“构想与实行的分离”，并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加以注意的彼拉维拉曼的这些观点是极为杰出的。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些杰出的观点，我们应该再一次注目于历史唯物论的命题，使它得到创造性的发展。

以新马克思主义为首，当前，放弃马克思、列宁的命题的倾向正在加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才想讲述这些。这是笔者的主张。

## 结 束 语

苏联8月政变之后，在日本的金泽市召开了一次经济理论学会，在全体会议与分科会议上，“大西广的国家资本主义论”，“大西广的软性化社会，即社会主义论”受到了一些评论。那时，笔者重新感觉到，理论的创造在当今是多么的急需。如果一般的企业都已迎来了不可缺少创造性的时代，那么理论领域也应该如此。确实，如果不是在这种背景与环境下，本书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

笔者必须谦虚地说，这个“创造性的理论”受教于很多学问高深的先生们。例如，尾崎芳治先生的“资本的本质就是专制指挥”的论述，中村哲先生在经济史学上的诸多概念，山口正之先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置盐信雄先生的“所有的本质是决定”的观点，平野一郎先生的“发展的”见田伦理学，野泽正德先生的自由主义及其对年轻人的期待，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人类发展论，等等。

另外，本书的一个论点，即“机械制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获益于中村静冶先生所论述的“机械制大工业之上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体制”的观点，在此特表谢意。当然，本书中对各位先生所说的内容如有误解，其责任全在笔者个人。

象前言中所写到的那样，本书是根据苏联政变的情况急速完成的。但是，补论中的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菲利浦斯曲线与滞涨过程”，“应该如何超越彼拉维拉曼”则是笔者以前发表的论文的再引用。那两篇论文分别登载于《立命馆经济学》（第39卷，3号，1990年）与《经济科学通信》（第62号，1990年）。另外，在本书中，还使用了笔者其它两篇已发表的论文，一篇是“企业社会的变革—新型年轻人的影响”（与野泽，木下两位先生共同编著的《自立与协同的经济体系》，大月书店出版，1991年），另一篇则是“关于生产力的历史性格”（《经济理论学会年报》，第28集，青木书店出版，1991年）。在此，谨向各位编辑及出版社致以谢意。